



獨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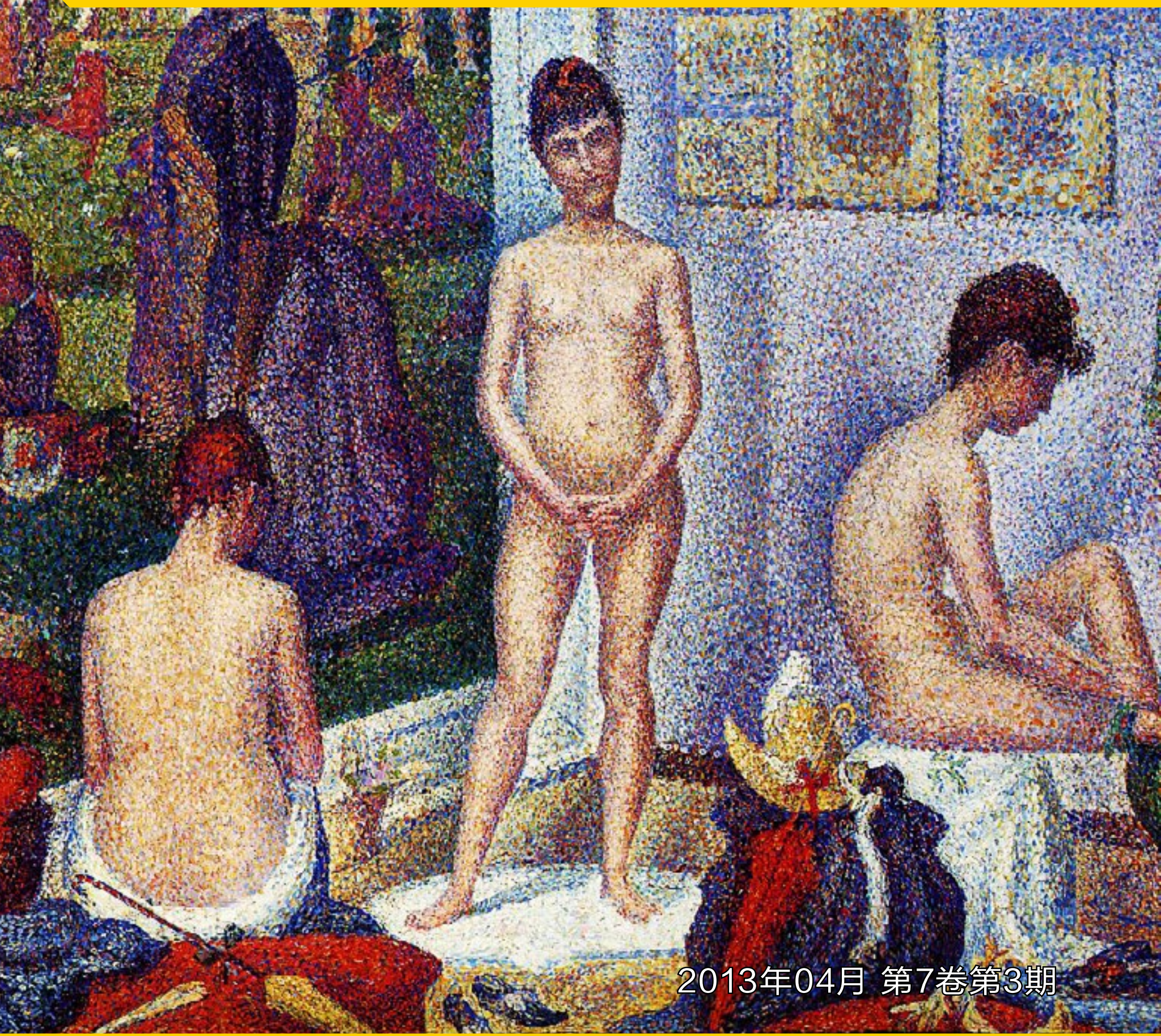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他，告诉你自由的尺度
在“鲁迅也是人”的背后

上帝的小提琴

禅意的色变

玫瑰色的你
——专访张悬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執行編輯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汪 伟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言 一

观察员

文学：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 良（北京）
刘 柠（北京）	严 飞（美国·旧金山）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燕 舞（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米 格（广州）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3年04月 第7卷第3期

总第64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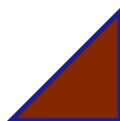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5 年内经历了两次大地震，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幸运抑或不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5 年的时间或许已经足够去让你抹去一些曾经有的希望。震前，我碰巧去了趟雅安，从一位 89 岁的老人家嘴里得知野生的雅鱼是如何因密布的小水电而绝迹；震后，我讶异地看到彭州的大型石化项目竟已准备在盆地冒烟。经由网络，更多的肆无忌惮在眼前上演：兴教寺，鼓楼大街，什刹海胡同——这背后是一种比 5 年前要疯狂得多的加速剥夺与贪婪；与此同时，作为弱者，我们手边能拿起的武器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容易沦为各种媒介消费的客体。

5 年前，我刚开始为《独立阅读》撰稿，对于基于阅读和写作的坚守信心满满；5 年后，我对着满屋书碟，惶惶不安，四处寻觅可以安身立命之处，以至于连读与写都变得像一支安慰剂。



目录

封面用图
the models
Georges Seurat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思想 • 成 庆
文史 • 王晓渔
社科 • 孙传钊

005-016

海外飞鸿

• 罗四鸪
他, 告诉你自由的尺度

017-020

随笔

• 刘 柠
在“鲁迅也是人”的背后

021-029

音乐

• 马慧元
上帝的小提琴

030-033

插画

• 李清月
禅意的色变

034-039

访谈

• 茱 茱
玫瑰色的你
—— 专访张悬

040-053

观察员 成庆（上海， veron.cq@gmail.com）

如今略微盘点一下大陆的名山古刹，已被收费景区包围的几占多数，大凡略有历史文化价值者，皆会被地方政府以发展旅游经济为名，将寺庙及周边山林河泽一同纳入“保护范围”，堂而皇之地售票营业。而且此类名山古刹所在的景区往往门票价格不菲，常逼得寺院为让信徒方便进出，不惜与地方政府针锋相对，其中不乏“胜利”之先例，如天童寺景区从2012年开始基本取消门票，可谓一大突破。浙江天台山景区则一直图谋加价，但每提此事，则遇国清寺老方丈反对，后来干脆称病不见，遂保得天台一方山水，至今还算清净之地。但方外之人毕竟难敌“孔方兄”，此类抗争，或小胜，或平手，大多数仍逃不了“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命运。

过去这类“寺庙搭台，经济唱戏”，毕竟只是围城效应，寺庙之内，尚是僧团之领地，景区尚不得擅入侵犯。但日前西安市以“丝绸之路申遗”为名，要让驻锡于玄奘埋骨之地——兴教寺的僧团悉数撤出，仅保留唐代所建之兴教寺塔，余者寺院建筑均要拆除。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所透露的消息，在相关的专家会议上，兴教寺主持宽池法师表达意见时，当地政府官员相当颠预无理，“‘申遗’的事情，政府作了决定。”以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决定宗教活动场所的命运，抛开背后巨大的商业开发利益链条不计，只能说当地政府主政

者虽然以“申遗”为名，其无知与无理很难让人信服，他们所作作为，更像是一场“扯虎皮，拉大旗”的阴谋剧。

“驱僧申遗”此类政教冲突事件，对于中国佛教史而言并不算新鲜，从晚清开始兴起的“庙产兴学”，图谋庙产的行为此起彼伏。最近一次大规模的驱僧行动，就是北洋政府与佛教界之间的“庙产危机”。名僧寄禅(八指头陀)在与政府交涉期间神秘去世，引发媒体舆论的巨大反响，而就在寄禅法师事件之后，当时的政务院也被迫停止征收庙产的行为。而在陈金龙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以佛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11年1月)中可以看到, 后来的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关于庙产的博弈过程一直持续到抗战期间。从时代背景来看, 国民政府试图吞并众多寺产, 于是在“反对迷信”、“庙产兴学”等看似合理的旗帜下, 进而却带来了一股强烈的“驱僧”、“灭佛”浪潮。如冯玉祥就将开封相国寺改为市场, 将救苦庙改为救济院, 驱离寺僧。由此或可看出, 今日文保部门协同旅游景区以“文物保护”为名, 所上演的这一出驱僧的戏码其来有自。

在当年“庙产兴学”的高潮期, 佛教界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 开始以社会组织的形式来与北洋政府进行交涉和博弈, 但这一波佛教社会化的趋势, 后来又在1949年之后戛然而止, 也自然埋下了今日“申遗驱僧”的病根。

换个角度来想, 今日佛教地位之衰微, 自然有权力的傲慢与无度之前因, 但也与佛教本身长期积病沉疴有莫大的关联。年轻人对佛教充满误解, 将其视为迷信与祈福, 不仅不会生出尊敬之情, 反而常会诽谤与拒斥。相比台湾佛教的现代化而言, 大陆佛教的“年轻化”显得前路漫漫。

前不久带领历史系学生前往普陀山各大寺庙参访, 年轻人初初接触佛教, 难免问题多多, 例如佛门礼仪、佛教建筑布局乃至僧人生活细节等等, 问题不一而足。吾虽勉力答之, 但终有力所不逮。回想当初为了解佛门常识, 曾翻阅多本书籍, 其中独有白化文先生的《汉化佛教与佛寺》(北京出版社, 2003年版)最



为翔实, 深入浅出, 而且此书不断重版, 至今仍长销不断, 可谓是了解汉传佛教的最佳入门读物。

就以普陀山佛像为例, 因此地为观音道场, 因此普济寺大殿供奉观世音菩萨为主尊, 号为“圆通殿”, 而大殿两旁则为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 符合《普门品》中观音化身三十二相所述。如此种种, 皆可从白先生的小书中获得答案。如进一步想了解佛门法器名物, 白先生另有一本《汉化佛教三宝物》(华龄出版社, 2009年)可供查阅。举例而言, 学生进入寺庙, 多有问及寺中那悬挂于屋檐下的鱼状器物, 此乃木鱼一种, 用于报晓吃斋集合之用, 也称“鱼梆”, 隋唐时期开始流行于汉传庙宇之中, 千年沿存至今。

此等名物知识, 翻阅工具之书皆可答之, 但佛教或许难于, 其义理既简且繁。说简, 一句

话头参下去，即是禅宗直了心性得解脱；说繁，则要唯识名相慢慢解来，非十年八载，方得其中三昧。但无论如何，要了解佛教，当然不能停留在心灵鸡汤式的法语上，但也不能以纯粹知识的心态去深入，而是要有理有行，如不能在进行履上落实，佛教的真义总是有所隔膜。

当然，作为传承上千年的传统，佛教不仅对于佛教徒而言有特别的教导意义，对于一般人而言，常也能激发起强烈的“宗教感”。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当年欲为鉴真和尚作传，虽苦于难通汉典，但仍为奈良时代的文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的文字所感动，最终写下著名的小说《天平之薨》（谢鲜声译，南海出版社，2013年1月），其书名意为彰显鉴真和尚乃是日本天平年间文化与精神之脊梁。

平山郁夫是日本著名画家，15岁时曾遭遇广岛原子弹之劫难，深受核辐射后遗症之苦，后因机缘所致，开始创作以玄奘取经为主题的《佛教传来》，身体反而痊愈。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他多次来华访问，不遗余力地推动敦煌的文物保护事业。在其自传《悠悠大河》（杨晶 李建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当追踪玄奘三藏的足迹时，我唯有惊叹：同样为人，玄奘三藏竟能如此！杀戮人的是人，给予人希望的也是人。”

是啊，杀戮人的是人，给予人希望也是人！邻国之人尚会为东土僧人跨洋所携来的经典与精神所感动，且历千年不忘，今日那些以“申遗”为名而想驱离僧团的人，又为何不能给予这个民族以希望呢？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l978@sina.com）

在《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13日）看到梁文道先生推荐《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4月），就记住了书名。或许选题有些偏僻，迟迟未能找到。前几日去刚刚搬迁的季风书园，在门口见到厚厚一摞，买回去细细读，没有失望。再看版权页，如此专门的一本书，已经是第2次印刷。

1901年，梁启超把“民族主义”这个词引入中国，从此民族主义成为挥之不去的幽灵。知识阶层希望以民族主义推动民权，但事与愿违，常见的是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放弃民权、摧毁民权。虽然民族主义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华夷之辩却由来已久，这也是民族主义迅速被中国各阶层接受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频频挨打，根本原因正是以华夏为中心视万国为蛮夷的天朝思维。

从华夷大防到天朝上国再到排他型民族主义，开放的中国逐渐成为封闭的中国。易华先生的夷夏先后说，对天朝思维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他从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出发，再上层楼，指出两者“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通过历史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四个维度的考察，易华指出汉族是夷夏混血，“中国文化是本土起源的定居农业夷文化与外来青铜游牧夏文化反复混合形成的复合文化。”把夷视为外来敌对势力，把夏视为本土光荣传统，不是



什么家国情怀，是数典忘祖——“夏崇拜实质上是自我崇拜，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这本书可与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0月）搭配阅读，后者收有《夷夏东西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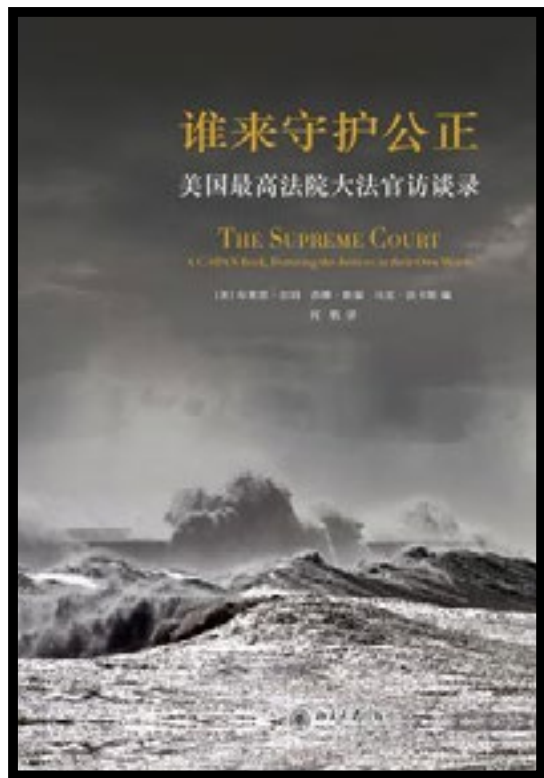
易华认为，中国文化有天下主义等观念与民族主义对冲，对民族主义“不可轻视，亦不必恐慌”。虽然我也认为公众中的民族主义观念被过高估计了，但是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它是一个便于被权力使用的政治正确的符咒，去年发生、至今如谜的“915反日事件”即是一例。更何况，中国不仅有天下主义，也有与之相反的天朝思维。

《夏道平文集》（长春出版社，2013年1月）是一本被忽略的书，内地对殷海光和雷震均有介绍，如王中江的《炼狱：殷海光评传》（群言出版社，2003年）和范泓的《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原名《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都值得一读，但是对夏道平的介绍非常有限。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内地出版了两个版本《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年）和《人的行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前者不忍卒读，后者也陷入关于翻译的争论。奇怪的是，夏道平翻译的版本没有被直接引进。夏道平是一位经济学者，也是《自由中国》的主要作者，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是闻名一时的文章。前几年“钓鱼执法”事发时，重新找到这篇文章阅读，隔着五六十年来看，一点也不过时。

国民党政权既在20年代以俄为师，又在30年代学习德国特色，兼具左翼和右翼政权之短。台湾反对运动的精神资源，一方来自呼吁平等的左翼，一方来自呼吁自由的右翼，左右夹击。对于前者，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亲缘性，内地政府持欢迎态度，甚至多方统战，比如陈映真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斗士成为花瓶。夏道平属于后者，认为“政治民主是要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他并不反对平等，只是认为平等主要指人格平等，并非经济平等，尤其不能同意政府决定经济平等的思路，认为“本质上并不是把富人的所得转

移给穷人，而是把私人的经济权力转移给政府”。这些写于台湾威权时代的文章，尤其适用于今日中国。一个权力几乎不受限制的政府，只有可能与民夺利，不平等的根源是不会考虑平等问题的，虽然会把平等作为口号。

美国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布拉格的旅游景点注意到，美国人和西欧人会对卐字徽章深恶痛绝，却不排斥锤子镰刀图案，“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她指出，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不仅是极左派，也包括那些被共产主义理想诸如社会公平、人人一律平等吸引的西方人。俄罗斯对那段历史的态度更为暧昧——否定但是遗忘。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戴



大洪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结尾这样写道：“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在《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布莱恩·拉姆等编，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的腰封上，印着这么一行字，完胜那些印满名字的腰封。这本书读来比较轻松，可以近距离了解大法官们的法治理念，也可以“偷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遗憾的是，任东来先生于5月初逝世，他领衔撰写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和《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是关于美国宪政理

想的入门书，可惜他计划中“美国宪政历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美国宪政的守护神：10位最有影响力大法官的司法人生》再也看不到了。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民选的代议机构是通往古拉格之路的两大路障，一旦它们成为摆设，通往古拉格的道路也就一马平川了。

虽然世风日下的叹息不绝于耳，翻开《行动改变生存：改变我们生活的民间力量》（寇延丁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扑面而来的是复苏的善意。这本书主要讲述NGO的故事，在公民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一部分人怎么先让自己成为公民。寇延丁在后记中讲到去道德化、去悲情化，这本书以身作则，既讲到公共参与的愉悦，也没有回避其中可能遇到的懈怠，远离了“感动中国”的道德悲情。或许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悲情之后的自我感动或者戾气，先让自己变得清新起来。Q

观察员 孙传钊（上海，sunchuanzhao@yahoo.com.cn）

五、六年前读过《古拉格：一部历史》

（安妮·阿普尔鲍姆著，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3），印象深刻。该书印证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亲缘性，在集中营这个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体制代表性事物的问题上，苏俄是纳粹的老师，革命胜利后，列宁、托洛斯基执政时代，捷尔任斯基组织契卡，大肆逮捕反对派，导致沙俄时代已有的监狱“客满”，大量新集中营应运而生。这一点说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暴力恐怖不是从斯大林篡权后才开始的。

甚至在用毒气屠杀囚徒这个使用现代技术屠杀的开创性的罪恶，苏俄也不落纳粹之后。苏俄集中营的另一个特点，作为高效低成本生产性机构来实施，与纳粹集中营的初衷有所区别，由于这两个青出于蓝特点，所以该书常被198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论争中的“右派”学者作为一种论据来使用。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苏俄结束这种关押政治犯集中营制度的是戈尔巴乔夫，戈氏的祖父系政治冤案在斯大林时代是集中营的牺牲者。这可能是戈氏决议废除这个制度的私人动因——历史偶然性，但苏联在后极权时代，乃至斯大林时代，戈氏依然能在苏共内不断晋升，表示他依然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也正是库斯勒《正午的黑暗》及其主人翁鲁巴舍夫显示的关于“忠诚”命题具有的警世和普遍意义，所



以奥威尔、托尼·朱特都认为《正午的黑暗》是库斯勒最出色的作品！阿普尔鲍姆写作所援引材料，也反映1990以后，不仅人们记忆的枷锁被拆除，对其写作有巨大作用，也表示苏俄民众的意识与我国民众之间的差距。

3个月前在网络上看到内部消息，说《被禁锢的头脑》（米沃什著，乌兰 / 易丽君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封面也印好了，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版不了了。于是买了一本日译本收藏，很便宜。日译本是在10多年前读过的。到了3月下旬得知中文版终于问世，波兰驻华使馆在北京还举行发行仪式，我也破费买了一本中译本，其实，书中论及的四个作家

(诗人)的篇幅(各一章,也是全书最重要部分),10多年来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分别刊登在几种文学刊物上。我重新读了一遍日文版,留下的印象有四点:1、米沃什当年留在法国不归,需要极大道德勇气。当时法国知识界是亲苏左派的天下,他的这本书虽能出版,但是一本也卖不掉;只有个别同样从斯大林主义信仰中走出来的加缪同情、支持他;他申请美国签证时,还有旅法波兰人对美国使馆说他是波共放出来的“鼯鼠”——线人,不要给他去美国的人境签证。米沃什估计自己这本书倘如在美国,出版也成问题。他到美国后,经济一直拮据得“像风箱里的老鼠”,与波兰作家享受与部长同等待遇成很大反差。2、他强调此书是论文,真人真事,记叙那种体制下的“故事”不能用虚构体裁。关于反映极权主义体制虚构的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真实感染力问题,该书问世30年后,还曾为欧美文学家讨论的论题。3、米氏政治伦理意识贯穿全书,米沃什对自己一度信仰陷于歧途作了自责,这是难得的。中国一些老前辈公知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作为体制内温和派、开明派停留鲁巴舍夫的认识水平上。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东欧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倾向反省内在政治信仰和道德观,这一点和我国目前膨大的公知群体主流的写作主体取向不一样。4、他在该书开头推荐的波兰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 1885年2月24日-1939年9月18



日)1930年出版的小说《贪得无厌》(《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米沃什又提到维特凯维奇,以前在《米沃什词典》中也提到)。《贪得无厌》的故事是通过一个18岁的高中生——烦恼男孩齐普乔的眼睛去看待西方文明的瓦解过程。英俊的男孩继承了波兰的一个大酿酒厂,自己却是个空想主义者。他在两位求爱者的亲近过程中变得腐败堕落。分别是颓废的公主爱琳娜,她追求的是他的钱;另一个是疯狂的同性恋僧侣,看中的则是他的处子之身。随着这展开的故事,充满了色情的性描写,而这种狂热的性描写正是为了突出动物性肉欲泛滥是社会腐化的特征。小说描绘现实波兰知识界宗教界\政界\军界全部腐化,精神文化——形而上的、高雅东西全部被色情、性欲、金钱、奢侈

的物质取代，为何会变得这样？当时波兰边境——波罗的海附近已经被支那、蒙古军队占领，乌烟瘴气已经蔓延到波兰内地，最后波兰被支那、蒙古军队攻占。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未来世界——遭受中国攻击的东欧，充满了黑色幽默、性爱嬉戏以及被讽刺的社会经济学教条，援引不少现代哲学的概念，被称为是“未来主义派”的作品。《贪得无厌》预言准确，当前中国社会不就是一个纯粹的“物国”、“欲国”？不就是连花朵喝的、延续后代的真奶粉都消失了的经济大国？米沃什在《禁锢》中还提到维特凯维奇在德国入侵波兰不久自杀身亡——安眠药加割腕。但是《诗刊》（2012年4月号下半月）刊出李以亮的《维特凯维奇的自杀》一文，李以亮可能没有读过《被禁锢的头脑》，误读《米沃什词典》中“厌恶”词条（93-94页），以为维特凯维奇1939年在俄国一餐厅开枪自杀。另外，虽然目前没有《贪得无厌》中译本，但是已经有不少网民已能通过盗版看到小说改变的波兰电影《贪得无厌》（2003年），从网上的反响来看，大多人都不懂这电影真实价值，把它作为同性恋的黄片看待，有个网民的留言还恨维特凯维奇把全世界精神生活堕落归咎中国人，说当年苏德两国应该永远灭了波兰。这个网民的心态与希特勒、斯大林倒是一致的。倒是大众普遍肤浅的审美、赏析和解读能力，造再多的豪华的大剧院，只不过给暴发户提供装风雅的场所，也正说明维特凯维奇预言中的。

出于慕福山的《终结》一书之大名，花50元买来的这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弗朗西斯·福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书，所以虽然是这个领域门外汉，还是耐心地通读了一遍，还没有反复细读该书。感觉是福山对前人类时期的各学科先行研究的综述非常有趣，即从类人猿开始寻找人类群体生活规则的源头——政治制度起源，但是可能为了全书篇幅均衡之故，以法、美两国政治制度衰退历史的叙述不够精细；对中国政治制度历史的叙述，似乎也不是他的强项，可能因为熟悉的祖国日本的政治史起源较中国晚得多，所以东亚选择了中国为例子。

《共和的危机》（阿伦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系阿伦特最后一部著作，用我国今天流行的词语表达的话，是一个公知运用抽象的学理写成的时事评论，表达了她对美国政治制度日益衰退的忧虑。她从一个无国籍“贱民”、流亡者成为美国公民后，通过著述、讲学来亲自参与政治活动（active，我国译者一般翻译成“行动”）。此书反映在那激荡的60年代，即反越战、公民权运动和大规模的68学生运动中阿伦特的亲身参与。中译本的长处，陈伟写了一篇深入浅出的序言，有利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功亏一篑的是，译者虽然是相近专业的学者，从译文来看，似乎并不熟悉阿伦特及其著述。因为英文不是母语，习惯于用抽象表述，阿伦特的著作确实有许

多批评她的人所指出的弱点，所以本来陈伟应该当仁不让地自己担负起该书翻译工作。另外，不熟悉1960年代美国政治史、社会史的中国读者，很需要译者再增加一些社会背景和相关人物的注释。总之，书中的观点，反映了阿伦特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立场，她那独创性的论断，具有前瞻性、预言性。尽管她本人最反对历史预言，但是独创性的知性，让她的著述表现出远见。比如，她指出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不够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政府的透明度、不隐瞒，这需要公民参与政治活动（active）。她的担心危机不是杞人忧天，伊拉克战争中布什政府，在制造战争理由时，又以谎言欺骗了国民；又如，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性”、部分实施了“公开性”之后，苏联不久就瓦解了；再如，她独创的关于暴力和权力区分的概念，说暴力只是工具，权力本质上是人们的组织行动，在这几年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化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阿伦特这本文集涉及的三个主题：政治谎言、暴力和公民不服从，虽然文本中也能读到少许关于极权主义体制下三者可能性的分析，但是整体来说是“时评”是围绕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来谈的，我们在阅读时必须注意这一点，不能生搬硬套。所以，关于极权主义体制下、或后极权主义体制下这三种政治现象的分析，还是需要结合她的其它著述一起来考察、解读。总之，由于我国不少公知还多是拒绝“极权主义”这个概念，而阿伦特是运用这个概念一举闻名的学者，加上上述她

的著述的一些特点和她与海德格尔的瓜葛，她的著作在我国还只是引起人们好奇性的时髦学术而已。可喜的是，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已经买下几乎剩下的所有阿伦特著作的中译本翻译权。

由乌卡什·贝尔特拉姆编辑的《卡廷惨案真相》（乌兰译，新星出版社，2012），该书收集了150多份日记、密电、供词、秘密协定和30多幅现场会照片，即关于卡廷惨案的1939年至2010年间的原始文件。全书是材料的罗列，不清楚这事件真相的人、或者更严密地说，不研究这个历史案件的学者，并不能理解这些文件的价值，也无法把这些文件串联起来，重构真相，哪怕他看过波兰电影“卡廷惨案”。而且，就中国学术界的东欧、波兰研究的现状来看，几乎也没有人能承担、会



去承担这一课题的研究，该书除了书名吸引眼球之外，也就完全失去了中国读者。维克多·扎斯拉夫斯基的《阶级清洗：卡廷屠杀》

(Victor Zaslavsky, Pulizia di classe: Il massacre di Katyn) 2006年在意大利出版时，欧美出版的关于卡廷惨案的书已经不下千余种，所以要对先行研究有所突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扎斯拉夫斯基的这部著作还是引起欧美学术界、读书界的瞩目，是因为在卡廷惨案大致轮廓已经清楚的当今，扎斯拉夫斯基在书中并不是用力更加深入、细致地考证关于当年几十万波兰被俘军人的下落众多的疑案[众多尚未搞清楚的微观细节之疑点的历史学研究，如果2011年5月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V.Medvedev)对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B.Komorowski)做出的开放所有有关卡廷真相的国家档案之承诺得到兑现的话，估计欧美会有更多的关于卡廷事件的历史著作问世]，而是着力论证卡廷惨案自1943年进入人们视野之后，其真相在以后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苏联瓦解前三年间，事件真相怎样被当政的戈尔巴乔夫(M.S.Gorbaciov)不断掩盖起来的那段历史及教训。2007年柏林出版了该书的德文版；2008年在纽约又出版了英文版(Class Cleansing: The Massacre at Katyn)；今年日文版也问世了。其德文版获得海因利希·贝尔财团颁发的2008年度“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2007年度该奖授予托尼·朱特《欧洲战后史》(J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2005)]。由德、法、意、波等国政治学学者组成的评委的授奖理由是：“扎斯拉夫斯基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政权采用的一边承认苏共和苏联国家权力核心所犯的罪行，一边采用极力掩盖卡廷惨案真相的策略，其对卡廷事件教训有冲击力的分析，为欧洲史研究做出了贡献。”真不明白，新星出版社和我国研究波兰的专家为何不选扎斯拉夫斯基这样的著作出中译本，非选这本《真相》？如果说该课题的经典研究的话，1962年波裔美国学者扎沃德尼的《森林死亡》(Zawodny, J.K., Death in the Forest: The Story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在不少新史料发现的今天，依然不失其卡廷事件研究史上名著的地位。战时为了争取苏联有力对德作战，美英两国都对公众和波兰流亡政府隐瞒他们所掌握的真相。二战结束时根据瓜分战后世界的雅塔尔协议，1945年以后罗斯福和邱吉尔干脆把整个波兰交给了苏联，是对波兰最大的背叛。英、美两国战后没有改变在卡廷事件上这一立场，美国政府至少到1951年还是禁止谈起卡廷事件。尽管，战后英美两国协助苏联截断了获取真相的途径，但是，就是在这样是史料贫乏、极其困难的岁月里，有良知的研究者扎沃德尼对卡廷事件还是做出出色的历史考证学术成就，从学术角度评判的话，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对我国研究现代史的历史学者必定有所启发。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于非历史学研究者的、普通读者来说，还具有历史故事的可读性。

《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他晚年的思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是马克·埃德蒙森的第二本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另一本中译本是《文学对抗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像麻将中“单吊”等待漫长12年，才“吊”出马克·埃德蒙森另一本书。殊不知这本新书的不少读者可能完全不知道还有一本12年前出版的埃德蒙森的《文学对抗哲学》的中译本。而《文学对抗哲学》是批评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以所谓的“理论”替代柏拉图以后传统的哲学对文学摧残。批评的对象是德里达、德曼、福柯这样的大腕，文学批评本来是埃德蒙森的主业。但是，我认为，貌似主题不相干、风格迥异这两本书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读者不要以为《最后岁月》读起来轻巧，最好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读，后者读起来有点难度的，其次，《摩西与一神教》也得复习一遍。再次，纪实文学体裁的《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的写作旨意在全书的尾声才作了强化，所以如果读者只是虎头蛇尾阅读、浮光掠影翻翻的话，会错过这最后的重要部分。概括地说，这本书是要叙述这样一段故事：1938年纳粹的爪牙铺天盖地般伸到奥地利、并吞了奥地利时，反犹狂飙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会遭到毁灭性的摧残，癌症日趋恶化的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维也纳，流亡英国。到了英国后，重病缠身的弗洛伊德仍不忘把3年前开始的、断断续续写到一半的《摩西与一神教》写完。尽管他知道这本书问世还会遭到犹太人同胞的怨恨，还是



执意要完成它、出版它——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究明欧洲、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宗教源头。埃德蒙森特意重提这段故事，最主要是再度唤起人们注意弗洛伊德当年写作的目的：告诫人们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和一神教，既是欧洲宗教、文化的历史宿命，又是其历史灾难悲剧的源头，要人们警惕21世纪的宗教激进主义。埃德蒙森要把弗洛伊德赞赏的犹太人的“抽象”与在文学批评中德里达、德曼、哈罗德·布鲁姆等人借用弗洛伊德学说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力图摆脱形象（隐喻）、创造“理论”中的抽象概念区分开来。他们用自说自话的极度抽象解读文学作品，这种虚无主义的背后，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一样，有不测的历史陷阱——极权主义会向他们招手。所以，他的《最后岁月》还弗洛伊德一个清白，还原一个真实的弗洛伊德的“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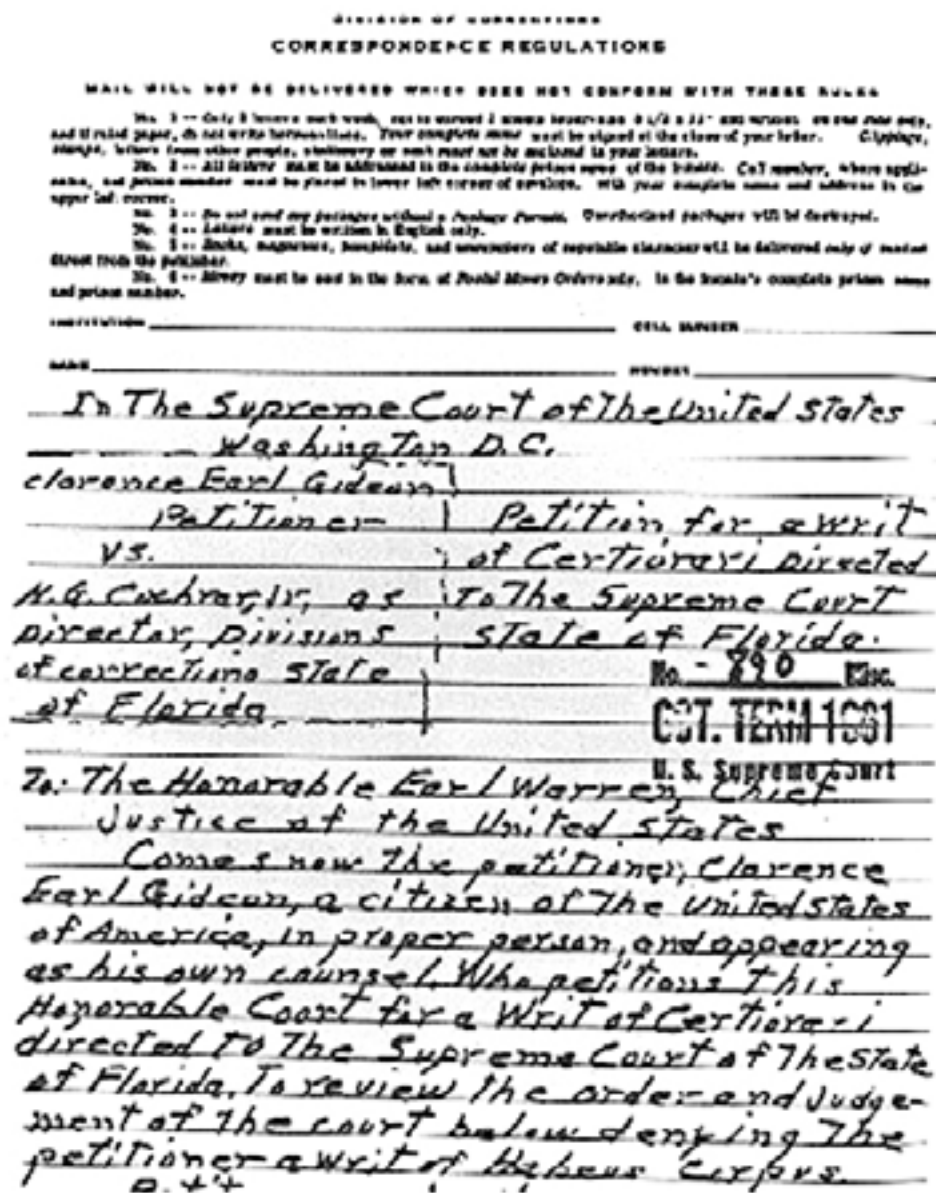
他，告诉你自由的尺度

特约观察员 罗四鸽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编译

OVERSEAS

1961年6月3日，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一家台球厅发生一起入室行窃案。一位嗜酒如命、半文盲、时不时轻度违法的51岁流浪汉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Clarence Earl Gideon)被捕，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吉迪恩被判处5年徒刑。为此，吉迪恩不服。他强烈认为，在没有律师辩护的审判中被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于是，坐在佛罗里达州的监狱里，他手写了一份给最高法院的上诉书，将佛罗里达州监狱的监狱长路易 L. 温赖特告上法庭。1963年3月1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就此案一致判决，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州法院应该在刑事案件中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人提供律师。这便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一个建立新先例的里程碑的案件：吉迪恩诉温赖特案。

第二年，一位记者利用当时因印刷工人罢工而报纸停刊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将此案件写成一本书，用简洁清晰、深入浅出的语言解析了第六修正案中“公平审判”权，以及最高法院的庭审程序、州法等相关问题。不仅如此，该书还将此案及其判决放到美国宪法与个人权利发展史，以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涨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美国宪法的制定与批准过程，是联邦主义者与州权主义者之间的一场互相争斗与妥协的过程。为了防止联邦宪法对州权和个人权



利过度侵犯，州权主义者提出了宪法批准条件，这便是美国宪法前十个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因此，可以说《权利法案》的制定来自一个设想：威胁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只可能是联邦政府，而关系亲密的州政府是不会成为威胁的。因此，虽然《权利法案》对于被控犯罪的人提供了若干保护，却没有关于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州和地方政府侵犯的词语，当

Clarence Earl Gideon手写的上诉书



时许多权利保障并未在州法院执行，如吉迪恩，这位来自社会最底层、常被人瞧不起的罪犯，并没有享有“公平审判”的基本自由。所幸的是，当时美国正出现一种日益高涨的情绪，认为宪法权利同样应对各州具有约束力。“正像吉迪恩案是有关请律师权利的法律动向的一部分，而这一动向又是公平刑事审判程序这一宪法原则中正在发生的根本变化的一个方面，刑事法的趋势也是整体局势的一部分。在其它许多领域，最高法院在上代人期间拓展了个人自由的维度。”

温斯顿·丘吉尔说，真正衡量一个文明社会的方式，是看它如何对待被控犯罪的人民。五十年后，这本记载美国文明进步的经典之书依然在重印，“肯定已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动身前往法学院之

前获得此书作为毕业礼物。”曾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执教、美国刑事诉讼法权威耶尔·卡米萨(Yale Kamisar)说。这本书便是大名鼎鼎的《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 Trumpet)，书作者正是改变了美国的司法新闻报道模式、时任《纽约时报》法律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

彼时，刘易斯虽时年37岁，却已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在他之前，负责最高法院判决的报道常常由没有法律知识的记者担任，乏味重复，缺乏法律推理与背景知识。刘易斯的报道改变了这一局面。他的不少文章如今被当做法学思潮教材。1955年，受雇于《华盛顿每日新闻》(The Washington

Daily News) 的刘易斯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海军雇员亚伯拉罕·卡萨诺 (Abraham Chasanow) 的文章, 让受到海军不公正审查的卡萨诺得以平反, 刘易斯也因此获得他的第一个普利策奖。同年, 他接受了《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詹姆斯·B·赖斯顿 (James B. Reston) 的聘请, 负责报道司法部 (Justice Department) 和最高法院。不久, 他便获得尼曼奖学金 (Nieman Fellowship), 专门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特别是和最高法院有关的法律”。

1963年, 刘易斯对贝克诉卡尔 (Baker v. Carr) 一案的报道, 使他再次荣获普利策奖。在该案中, 最高法院开启了由联邦法院监督立法选区划分的做法。他为《哈佛法律评论》(The Harvard Law Review) 撰写的一篇有关议员人数分配的文章, 甚至在判决书中被列为第27条尾注。当时接受过他采访的法官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 在其自传《最后期限》(Deadline) 中写到: “我无法相信这个年轻人取得的成就。在最高法院, 能像他这样掌握这些案件的法官, 不超过两个。”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开宗名义便说:

“国会不得立法 (make no law) ……”, 然后, 这条修正案及其他修正案列出了一系列政府必须保证的权利, 如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宗教自由等。然而, 这条修正案是极其模糊的, 200年来, 对于“不得立法”一直存在极大的争议, 此外, 何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这些自由的尺度又在哪里? 法官在面对具体案例时, 又该如何对第一修正案做出解释? 这些问题几乎成了刘易斯其后一生思



考的主题。1974年至1989年, 刘易斯在哈佛大学执教, 并自1982年起, 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麦迪逊讲席”教授, 讲授第一修正案与新闻自由。其研究与思考的结果汇集成两本书, 这便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批评官员的尺度: <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Make No Law) 和《言论的边界: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

1960年, 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 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 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 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 几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 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 在法庭上首次将宪法第一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原则应用于州诽谤法, 裁定: 政府官员就针对其公务行为的指责提起诉讼时, 必须证明有争议的说法具有“实际恶意”, 并宣布“对公

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三十年后，刘易斯重新回顾了这起自己亲身经历的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并循此为线，串接起美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司法抗争历史。现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罗伯特·D·萨克(Robert D. Sack)对此书评价道：这是“一本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历史的杰出的初级读本。”2010年，刘易斯又出版《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向读者介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美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可预计的将来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刘易斯的著作中，有两部（《吉迪恩的号角》《批评官员的尺度》）是对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任时的最高法院做出的里程碑式判决进行阐述的。沃伦在1953年到1969年之间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任期与刘易斯驻守华盛顿的时间几乎完全吻合。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学者罗纳德·K·L·科林斯(Ronald K. L. Collins)对此评道：“在提到沃伦执掌的最高法院的遗产时，你不能不提到托尼·刘易斯，他是这份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到‘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他为引入民权及公民自由的宪法革命做出了贡献。”

2013年初，为了写纪念“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五十周年的文章，因几个引用的问题，《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安德鲁·科恩(Andrew Cohen)很自然地便与他的前辈

刘易斯联系：“还会有谁能比他提供更好的文本和视角呢？”不过，科恩得到的回复是刘易斯的抱歉，因为他病得太厉害了，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当时，我为他祈祷，希望他至少能活过这个周年纪念，看到他的报道对美国人公民权利教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刘易斯做到了。在“吉迪恩诉温赖特案”判决五十年后，他不仅见证了美国对“公平审判”自由的发展，还见证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发展。不过，仅仅一个星期后，3月25日，因肾脏及心脏衰竭并发症，安东尼·刘易斯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家中去世。第二天，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就同性婚姻开始历史性大辩论，“可惜，他没有看到。”科恩说。因为刘易斯的妻子、已退休的马萨诸塞最高法院(Massachusetts Supreme Judicial Court)首席大法官玛格丽特·H·马歇尔，曾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做出里程碑式的判决，承认同性婚姻的权利。2010年，马歇尔退休照顾丈夫，“让刘易斯和我能够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2012年，《批评官员的尺度》获获南方阅读盛典“金南方2012最受关注年度十大图书”之一，刘易斯得知后，非常激动，专门为中国读者录制了一段视频，介绍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书名(英文名Make No Law, 笔者注)正来自宪法第一修正案。”

据说，多年来提倡“人民对政府的任何评论，都享有免责权”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在听到最高法院对“沙利文案”的判决后，说：“这是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当街起舞，敢问是何期？

在“鲁迅也是人”的背后

——兼谈鲁迅日记“失记”问题及其他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今年3月6日，《南方都市报》历史版发表了李传玺先生的《“一二八”事变时期的鲁迅》一文。紧接着，3月9日，腾讯《大家》又刊发了游有方先生回应李文的文章《鲁迅对日军侵华的态度》。二文拜读一过，触发了我自己的思考。有些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权且不揣冒昧，和盘端出，以就教于李、游二位先生和广大读者。

李文根据“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逾一个半月），鲁迅一家离开拉摩斯公寓内的寓所，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经营的内山书店（先是在北四川路店，后去了位于英租界内三马路上的分店）避难，而在北四川路店避难一个星期的经历，在《鲁迅日记》中几乎成了空白，仅补缀以“失记”二字，进而在“八次前往北新书局，三次讨了400元版税”之后，连续两天“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至“颇醉”，甚至酒后独自“邀妓”等事实，指出作为“左翼文化的旗手”的鲁迅，在“租界外正是炮火

连天”、“血刃塞途”，“十九路军正在奋力拼搏，上海市民正在积极支援抗战”的民族危机、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却“躲进小楼成一统”，“对自己所目睹的一切采取的是有意回避”，在“日记甚或文章中……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这与那个被认为“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民族英雄”，“反差也太巨大了”。因此，李先生“反对对他进行神化”，主张“要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

笔者完全同意李先生反对神话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的理念主张，但基本不认同其分析、推理和结论，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读懂了鲁迅。

应该承认，李先生目光的确很敏锐，提出的问题本身相当重要。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不仅未能成

为中國大陸学界的议题，甚至受到了有意识的过滤、屏蔽。但是，未能成为大陆学界的议题，不等于就没人关注。事实上，李先生提出的问题，并非新问题，无一不在香港媒体和日本汉学界讨论过，有些甚至是40年前就被拎出来反复检讨的老问题。李先生此番“旧话重提”，是否曾参考过这些意见不得而知，但既未在文中提及，笔者就权当是李先生自己提出的“新问题”，并予以简单回应。一个鲜明的感觉是，惟其是大陆学界、媒体从未“炒作”过的“新问题”，才越发具有“耸听”效果。李先生似乎颇谙个中三昧，字里行间没少抖包袱、亮噱头，甚至不无“卖关子”之嫌，令人读之莞尔。譬如，在谈到“邀妓”问题时，他写道：“……此时的社会，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时刻的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千万别吓着，千万别说我胡说。这就是事实。它是鲁迅先生自己记下的。”其实我觉得，有事说事，但大可不必如此危言耸听。

李文的质疑和指摘，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鲁迅日记》中的“失记”问题，二是内山完造的“间谍”嫌疑，三是“邀妓”问题。而早在1973年，香港作家、时任《百姓》月刊总编辑的胡菊人先生便曾在《鲁迅在三十年代的生活》一文（发表于《东西风》杂志1973年3月号）中提出过类似的质疑（除了第三点），以论证自己的前提和结论：鲁迅是人，不是神。三年后，在鲁迅逝世39年之际，有“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前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先生在“大东急纪念文库”举办的公开讲座上，做过一场题为《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的学术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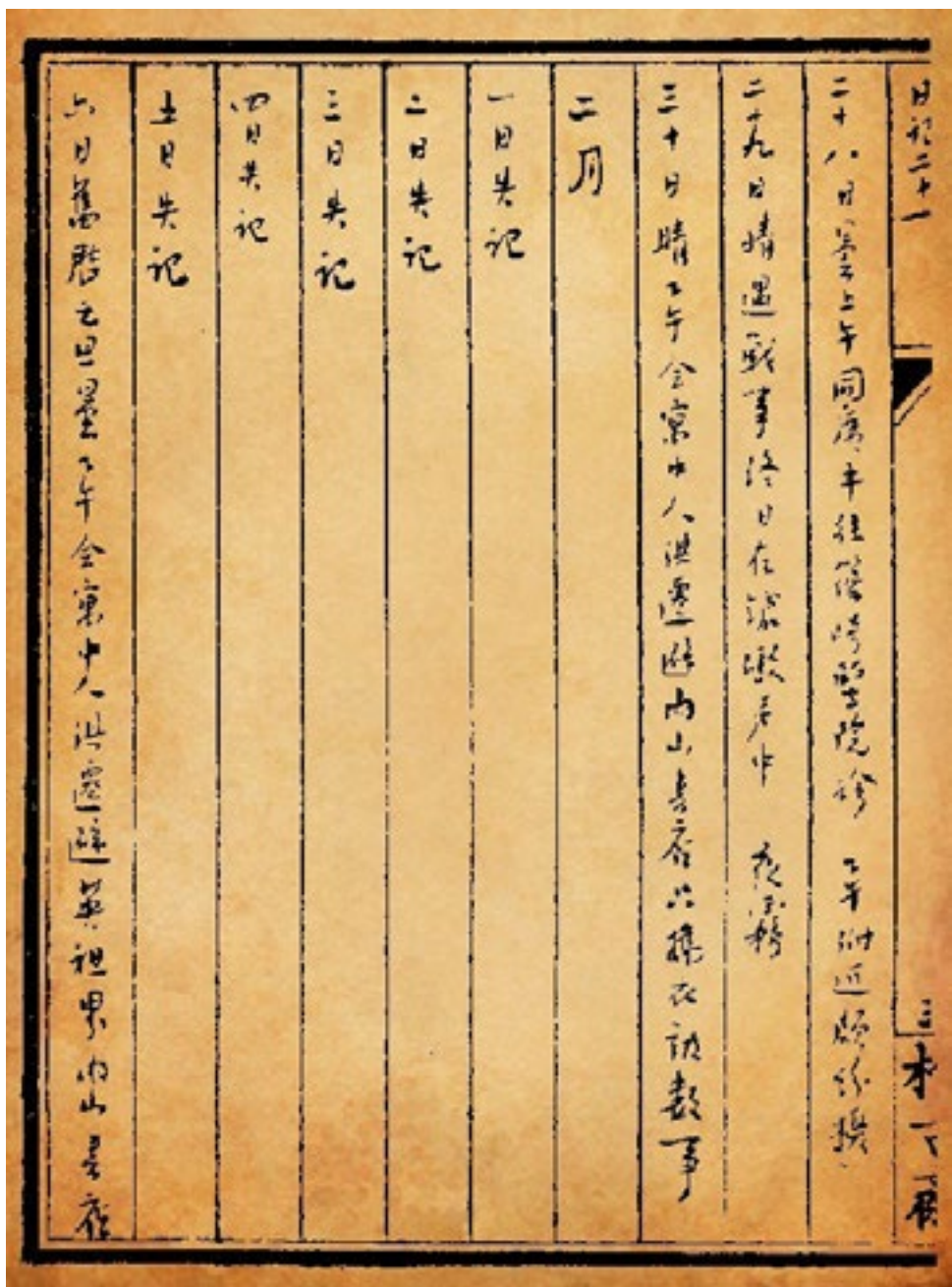
讲，联系内山完造及同时代其他人的回忆，对胡的质疑做了一番全面而翔实的回应。实际上，暂时抛却第三点，李文所质疑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是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的。而除这两点外，问题其实还关涉另外一点，那就是鲁迅在“一二八”事变前后，对日本和日人看法的变化——这一层，李文并未触及。为方便叙述计，我们先从李文的前两点质疑问入，再“迂回”到李所未涉及的其余，从而对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蜕变做一番抛砖引玉式的索隐。

众所周知，鲁迅有记日记的习惯。《鲁迅日记》从1912年5月5日起，至去世的前一天（1936年10月18日），25年如一日，几乎每一天都有记事。即使当日未及写，过后也

会补写；即便实在无事可记时，也会写上天气、星期，或缀以“无事”二字。“而有意写上‘失记’，即‘没有记事’的，只有1932年2月中的这几天。”（竹内实语）须知鲁迅在1932年1月30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以来，直至3月19日，“海婴疹已全退，遂于上午俱回寓所”，在“只携衣被数事”、“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的情况下，确乎不具备写日记的条件。所以，回家后，才一气补齐了避难期间约50天的日记（3月29日日记中写道：“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有的日子，记事颇详实，如李文所指摘的2月16日的日记写道：

十六日 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像记》拓片六种六枚，六元。又往蟬隐庐买《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作，与之一元。

记事长达129字，不但记载了五种书（拓片）名，且包括详细数量、价格，外加“饮酒”、“饮茗”、“邀妓”诸事，甚至包括与妓之小费的额度，不可谓不详。如此记录，可以想象，避难期间，鲁迅虽未能记日记，但应该是做了记录的。但其他日子该补的都补了，却偏偏漏了1月31日的日记，2月1日至5日，则仅缀以“失记”二字。对1月31日的“遗漏”，竹内实认为“也许是鲁迅后来补写时竟忘记了”。我也觉得有这种可能，但关键是其后5天的“失记”问题。



作为生前便得享大名的“文豪”级作家、普罗文艺的“旗手”，鲁迅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的日记在身后也会被人广泛研读，而既意识到这一层，同时把其他日子补写得不厌其详，却独以此前未曾出现过，以后亦未再次出现的所谓“失记”表述来记事，这肯定不是普通的事态，至少不是真的遗忘或无事可记。关于这一点，李先生的思考是对的，李文写道：“以鲁迅的记忆，怎么会失记呢，何况那几日对中日关系是那么关键，难道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难道黑暗中大人小孩一点异样都没有，难道黑暗中自己的心理活动也被黑暗遮掩了？”但是，李文的分析

和推论（诸如“鲁迅对自己所目睹的一切采取的是有意回避，抑或出于无奈的心情”，等等）却难以令人信服。如果事情真的那样单纯的话，就好了。

毫无疑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所追述的情形，尤其是在位于中日两军交战区域内的北四川路店（实际上是“全寓中人”挤在内山家阁楼上上的一个房间里）避难期间的所见所闻，无一不是鲁迅本人的亲历：

窗户是用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可尽管感同身受，鲁迅却未流露任何情绪于笔端——不仅未流露，还“失记”了。天晓得，在除夕降至的一周里，在那种无比逼仄、压抑的环境中，听着外面的枪炮、军靴声，看着日本店员们不停地做饭、劳军的忙碌的身影，鲁迅作何感想，何以排遣自己的心绪。正是出于这种困惑，李文发出了“那就是鲁迅真的平静了，或者说是太平静了”的感叹。

并没有可资指李文“错了”的绝对确证，但我总觉得李文的指责有些过于简单、

线性、轻易了——理由后叙。对此，竹内实倾向于：“也许鲁迅觉得，那六天的日记，还不如‘空白’着，更能标识出自己的深刻印象。我想，可能事实就是如此。正是因为自己有事情要记，鲁迅才故意让它留下了‘空白’。”关键是“空白”。在竹内看来，“失记”——这种在《鲁迅日记》中只在此处出现过的、绝无仅有的特殊表达，实际上要强调的不是别的，恰恰是“空白”。而这“空白”的意义就在于既不是没有日记（如1月31日），也不同于“无事”，而是“失记”，即“没有记事”：

“失记”中的“记”，有“记忆”与“记录”两种含义。如果“记忆”失去了，则应该还有点什么“记录”才好。但是，现在连“记录”也一点都没有留下。于是，在鲁迅的日记中，这几天里便没有任何记事。……可实际上，这里反复说到的这“失记”两个字，按中国话来讲，反倒竟意味着“记”下了一些什么。在我眼里，那便是听到了这“失记”两个字的反面，即“没有忘记”，或者是“怎么能够忘记”，另外还有“我要忘掉”的意思。

换句话说，鲁迅偏偏以“失记”的“非常规”表达，来记录一段内心很难过去的“非常事态”的发生——因系“非常事态”，本应记下来，但碍于种种，又无法明确记述，所以以这种方式加以“记录”。应该说，这种推理比较符合鲁迅的性格与智商。以鲁迅对现实的判断和深刻的历史感，他不会不清楚，诸如“一二八”这种事体，是断无法从历史中滤掉的。而他作为亲历者和被目

为“社会良心”的作家，也有一份记录及反应之责。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日记日后将成为重要的历史文本。在这种情况下，纵有万般无奈和难言之隐，他也不至于完全回避——于是，以连续5天的“失记”，共10个字，鲁迅对那段历史作出了自己的应对。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妨碍了鲁迅在日记中对事态的发生与进程详加记录呢？他到底有哪些隐衷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内山完造问题，也涉及李文的第二点质疑（请注意，这里笔者使用的措辞是“内山完造问题”，而不是“内山完造间谍嫌疑问题”）。李文根据内山书店北四川路店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相毗邻和事变发生后，同在附近的基督教堂鸿德堂中，一名蒋姓牧师和布道蔡某一家惨遭杀害的事实，及上述许广平的回忆（即在北四川路店避难的一周所耳闻目睹的情形），指出：“当年就曾有人指责内山是一名日本间谍，虽然书店位置和上述表现不能决定或者说明一切，但这些不能不让人起疑。”

李文对内山完造身份的质疑并不新鲜，历来有之，可并无确证。最近的一次耸动中国文坛的质疑是来自作家王朔：2000年，王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随笔《我看鲁迅》，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挑战鲁迅至高无上的、神祇般的权威，引发了“纸贵”效应。随后，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放言道：鲁迅“在上海住的时候也很会选择——选择的是日租界，他与内山完造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按台湾一些书中

的诽谤性说法：内山完造是一日本特务，他是用特务经费为鲁迅先生出的书……”我以为，朔爷放言的主要意义在反权威，打碎一切人造偶像，自有其价值，但他从未试图论证历史，况且也语焉不详，搬出李敖的说法打马虎眼，结果不了了之。相比之下，李文的质疑反倒更加严肃，有回应的必要。

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汉学系教授藤井省三在著作《鲁迅——活在东亚的文学》一书中写道：

日本侵略造成的满州事变⁰¹（1931）、上海事变⁰²（1932）之后，上海的反日舆论高涨。1933年，国民党系的《社会新闻》曾刊载了一篇记事，指内山完造是间谍。对此，鲁迅说道：“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作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是，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习的！”从文章中，可见鲁迅对内山完造的信赖之深。

鲁迅一生为日本所士林敬重，被看成现代中国文化精神不屈的象征，内山完造确在中间起了极其重要的、他人所无法替代的桥梁作用。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正是通过内山的牵线，日本众多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不断地前往上海“拜码头”，客观上也通过鲁迅这个彼时中国最大的“意见领袖”

⁰¹日本现代史对“九一八”事变的称谓。

⁰²日本现代史对“一二八”事变的称谓。



向世界传递了“活中国的姿态”（内山完造随笔集名），从金子光晴、武者小路实笃、横光利一，到野口米次郎、林芙美子、长谷川如是闲，从铃木大拙、山本实彦，到盐谷温、增田涉，不一而足。其中，颇不乏文学大家和学术重镇。

对所谓“间谍”的指控，内山完造自己全然不以为意。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过日本警察曾把他当成是CP（即共产党员），后看到他在基督教堂布道，才消除了对他的怀疑的往事。对此，竹内实说：“要是内山完造是向日本当局提供情报的话，恐怕当局是不会怀疑他是‘CP’，即共产党员的。而且，就内山完造的性格来说，他也不可能肯定‘间谍’那样的职业。”“而反过来，倒是有日本人怀疑内山完造是中国的间谍”，而且“曾被在上海的日本人武装自卫团体‘自警团’

中的一些人，叫去盘问过”。竹内先生说 he 时常在想：“是否有将遗骨埋在中国的日本人呢？如果有的话，那谁会代表呢？……每当在这种时候，我总是首先想到内山完造先生。……而实际上，内山的遗骨，也确实是埋在中国的。”试问，会有心甘情愿死后埋骨于中国的日本间谍吗？

“间谍”与“汉奸”，正是现代中国两顶最可怕的帽子，量产无数，要多少有多少。不仅内山完造，就连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自己，有时也难幸免。1934年，鲁迅曾如此写道：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⁰³

⁰³ 见《且介亭杂文》中《运命》篇。

实际上，李文对内山完造的间谍质疑，不仅人云亦云，毫无新意，而且有把问题简单化，把历史单面化之嫌。而历史是复杂的，有不同的侧面；历史中的人也是复杂的，可能有多种性格与面向。许广平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本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被李文当成了内山“间谍”嫌疑的“佐证”，而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恰恰是对内山其人复杂性一面的注脚。

内山作为明治中期（明治18年，1885年）出生，大正初年（大正2年，1912年）便来中国“闯世界”，谋求发展的日本浪人，饱受明治维新以降的国家主义思潮的洗脑，身上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烙印。读内山完造的回忆录，能明显感到这种印迹。但这与“间谍”是两码事。相反，内山完造是基督徒，乐善好施，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充满了同情。因鲁迅的关系，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参与营救、帮助了很多受迫害的作家，内山书店成了上海滩的一个准文化沙龙和左翼文化据点。

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人有时是一个矛盾体。在那个时代，内山要在日租界经营文化事业，帮助中国的左翼文化人，需维持一定的影响力，客观上不可能不与方方面面的日本人打交道，其中肯定也包括军人。对此，对人有非凡洞察的鲁迅自然不会全然不知情。但鲁迅并非道德洁癖主义者，对友人的行为方式、社会交往，他看在眼里，予以最大的理解，并不置喙。可作为一介文士，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在中日关系的夹缝



中，不置喙，不等于没感觉、内心没痛苦。在内山家阁楼上的小房间中避难的一周，在间或传来的枪炮声、军靴声中，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店员出出进进、劳军的忙碌，鲁迅的心境想必是极其复杂的。直到2月6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到了远离战区的英租界，才算彻底踏实了。而从北四川路（四马路）的内山书店去三马路一带的英租界，须经过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人自警团的警戒线，这自然也少不了内山老板打通关节，妥为斡旋。当鲁迅、周建人两家，连同仆人行十人，在内山安排的日本店员的带领下安全抵达三马路上的内山书店分店时已是大年初一了。

应该说，许广平在这一点上是了解鲁迅

的，她说：“……在鲁迅和内山完造之间，在他们深厚的‘纯洁’的友情之外，已渗进了无可奈何的‘不纯’成分。”很可能源于这段避难生活的刺激，鲁迅后来执意要找房子，准备迁出日租界，许广平和周建人的回忆均曾谈过这一点。鲁迅在临死前两天，还敦促周建人替他找房子，甚至用笔写了一方印文，让他拿去代刻一枚用于签赁房契约的印章（“周裕斋印”，谐音“周豫才”），“并说我定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问他”。（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日记》1936年10月11日写道：

十一日 星期。晴。……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

我想，问题的本质其实真的不在于内山完造是“间谍”与否，也并不单纯是鲁迅或内山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和历史使然。胡菊人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使用了“情势”与“情义”的措辞。作为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汉学家，竹内实则根据他对汉语的理解，对这两个词语做了一番语意学意义上的考察：

情势可以分解成“情”与“势”。这“情”与“势”是彼此矛盾的。家庭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情之“情”，常由于“势”，即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遭到破坏。“情义”亦是如此。“情”是会与“义”，也就是义理、信义，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大义相冲突的。……在中国，所谓“情势”和“情义”，就是这样内含着矛盾。其实，在鲁迅与内山之间，也

是有着这样的矛盾，尽管还没有达到彼此冲突的程度。如读许广平的回忆录，可以知道鲁迅已逐渐想与包括内山完造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断绝一切来往。

竹内甚至认为，鲁迅在与内山决裂之前去世，是“很值得庆幸的，幸亏是如此”。而且，“内山先生本人大约也曾有过像鲁迅那样的想法”，尽管他生前并未谈及这一层。

所以，历史是沉重的，错综的，特别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更是雾霾重重，压迫得人透不过气来。如果真的如李文所读解的那样，内山是“间谍”、“失记”概出于“有意回避”的话，那问题也许反而倒简单了。不过，简单则简单矣，历史也会丧失其张力，甚至被窄化、片面化。

与李文相比，倒是回应李文的游有方先生的文章，持论中肯、客观：“鲁迅确实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即在价值序列上主张国族高于个人，而毋宁首先是个个人主义者。在中日民族冲突如此紧张之下，作为个体的鲁迅和作为个体的内山完造仍然保持深厚的私人情谊，多半也要从这个角度来寻求理解”，可谓知言。检讨鲁迅在“九一八”之后至“一二八”前夕发表的五篇文章（《答文艺新闻社问》、《沉渣的泛起》、《友邦惊诧论》、《答中学生杂志问》和《今春的两种感想》），虽然直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三省侵略，同时却并未忘记呼吁青年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批判国人之“不认真”的恶癖，甚至唤起民众对在“国难声中”咸与爱国的“沉渣的泛起”的警惕。

鲁迅到底是鲁迅！他脑子里似乎从来没有所谓“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主次”之分，对言论自由价值的坚守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始终未渝，当仁不让；为确保自己的写作自由和人身安全，他选择在日租界定居，为此颇受文坛一些人的非难，而同时期的文人，多如傅雷那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可鲁迅全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写作，能向权力者和邪恶者射出“匕首和投枪”。

有人说鲁迅一生只骂国人，从不批评日本——这是误读。鲁迅确实深爱日本的文化，推崇日人的认真精神，说四亿国人统统害了一种叫作“马马虎虎”的宿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九一八”之后，中日关系骤然收紧，战云密布，鲁迅已高度警觉。一些日本作家刻意歪曲他的话，登在日本的报上，鲁迅很愤怒，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与（日本）名人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沟通。”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约鲁迅写文章，鲁迅直接以日文投书《火、王道、监狱》⁰³，以中国的民间传说对暴力与征服说“不”，通过日本的知识界，表明抗议军国主义的严正立场。日本著名记者、政治活动家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上海时代》中记录了去世前夕的鲁迅会见日本记者时的谈话：

鲁迅先生对十多天前来上海的山崎靖纯氏透露了他的信念。他说：“为了解放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同胞们，即使祖国中华民国变成沙漠，我们也决不停止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而此时，鲁迅已不久于人世了。种种迹象表明，他内心已经预言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并“提前”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姿态。

至于李文所指摘的第三点——“邀妓”问题，且不去索隐日记中的细节。即使鲁迅酒后独自“邀妓”确系事实的话，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记得，刚从日本回国的那些年，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为“压抑性欲”，“虽然在冬天，也不穿棉裤”（郁达夫语），彻夜抄着汉碑拓片……我的意思是说，禁欲也好，“邀妓”也罢，如果说多少关乎个人“私德”的话，跟“一二八”又有何干系呢？

笔者一向对造神运动深恶痛绝。反对神话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还“鲁迅也是人”之本来面目的诉求与李、游二先生毫无二致。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鲁迅也是人”背后的“景深”，看到处在历史与中日关系夹缝中的鲁迅，其黯然与沉默的后面，他的无奈与挣扎。Q

⁰³ 原文为日文，发表于日本《改造》月刊1934年3月号。后中文题目改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收入《且介亭杂文》。



上帝的小提琴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上帝的小提琴》是一部讲小提琴大师海菲茨的纪录片。我看完之后，第一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个细节：学生回忆起他教课，如果谁没拉好会被罚款，一般是五毛，收集起来给比较穷的学生买谱子。还有人被罚款是因为没去听米尔斯坦的音乐会。如今那个收集“罚款”的存钱盒还在，是一只土里土气的大嘴巴小丑，一按后面就吧嗒一声吞掉角子。这个细节竟然深深触动了我，也许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那个人的气场吧。一个陶瓷小丑玩具和那个神秘的人，竟然有这样的联系。喜欢音乐的人也许自然有这样的“天线”，乐于接收大音乐家的一物一景。片中的人物也是如此，海菲茨说笑话，海菲茨打乒乓，海菲茨在电话中说了好几声Hello——包括小提琴家帕尔曼都这样津津有味地回忆一丝一丝的细节。

关于海菲茨的天才的种种神话，我不

用重复了，因为也不知从何说起——关于他的音乐，可说的太多。当年他十多岁的时候，演奏生涯就如同直升飞机。不过年轻时候，在众多“脑残粉”的赞扬中，渐渐有人开始批评他“缺乏深度”，他当时受伤得想自杀。一切都过去了，他渐渐成为真正的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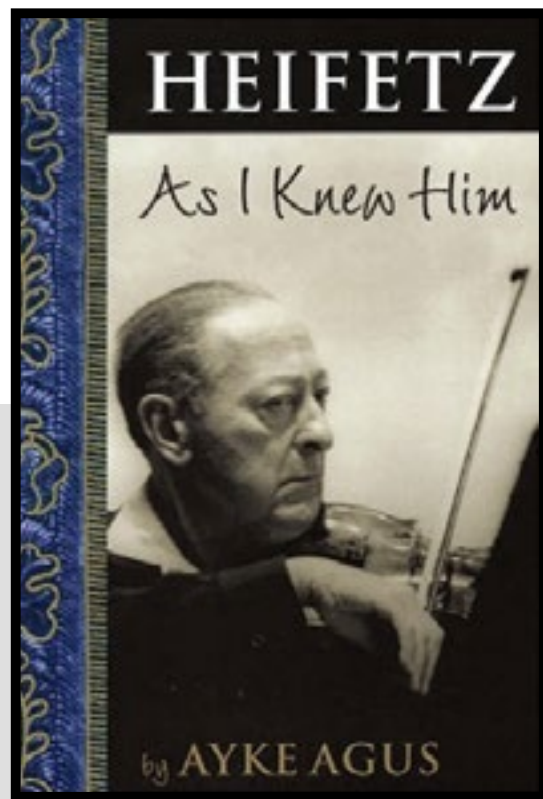
海菲茨的确太让同行羡慕。他生前占尽荣华，死后也矗立在古典音乐的众神殿里，不过这背后的代价一言难尽。他不大会爱，也不太被人爱——虽然崇拜和尊重他的人数以万计。从这个片子里，我读出的信息就是“孤独”。不管做什么事，达到这个高度之后，能交流的人寥寥无几，真是高处不胜寒。他也许天然有着拒人千里之外的性格，也许是在特殊的地置上，被环境驱动成了这样一个人。

他有过两次婚姻——都终结于离婚，

三个孩子，但他竟然一点点爱都舍不得给予亲人，不，他完全没有爱的能力。他说自己充满负罪感——要是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就好了，而什么都有了，才发现自己根本当不了父亲，也不能忍受婚姻。他承诺妻儿的事情，一件也办不到。因为演出太忙吗？也许是，可他倒肯花时间在上流社会交游。

话说《上帝的小提琴》这个片子，让我难忘的另一位是个亚裔女士，阿格斯（Ayke Agus），看上去和海菲茨关系很近，提起他时有着发自内心的依恋和爱怜，我有点好奇，她怎么对海菲茨的鸡毛蒜皮这样了解？正巧，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

《我了解的海菲茨（Heifetz——As I Knew Him）》，作者正是这位女士。原来，阿格斯本人也是了不起的音乐家，难得的是钢琴小提琴都很出色，她跟海菲茨学小提琴的时候，偶尔被他发现了钢琴才能，于是他要她放弃小提琴生涯，给他做钢琴伴奏。这件事定下来，阿格斯跟海菲茨相处十五年，其间她有自己家庭和孩子。她是他的私人秘书、伴奏、厨师、司机、知音，也是打杂的，常常跟保姆差不多。很多人读到这里大概想，这差不多是情人了，一男一女频繁单独相处在房子里，难道就没擦出火花？不过我宁信其无。海菲茨和女人长相厮守，几乎是难以想像的事情。情人之间是要求平等的，海菲茨没法照料别人，爱人如己，倒只有这种老板-雇员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为什么挑中了阿格斯？据她自己说，她是印尼-中国背景，有着亚洲女性的坚韧、柔顺、



善解人意，尤其能体贴老人（他们相识时，他七十岁，她二十岁），在音乐上也让海菲茨十分尊重，再加上两人的共同之处——都是曾经的神童，都早早开始养全家，都受父母严责而叛逆。海菲茨去世后，阿格斯完全无所适从，不知怎么支配分分秒秒——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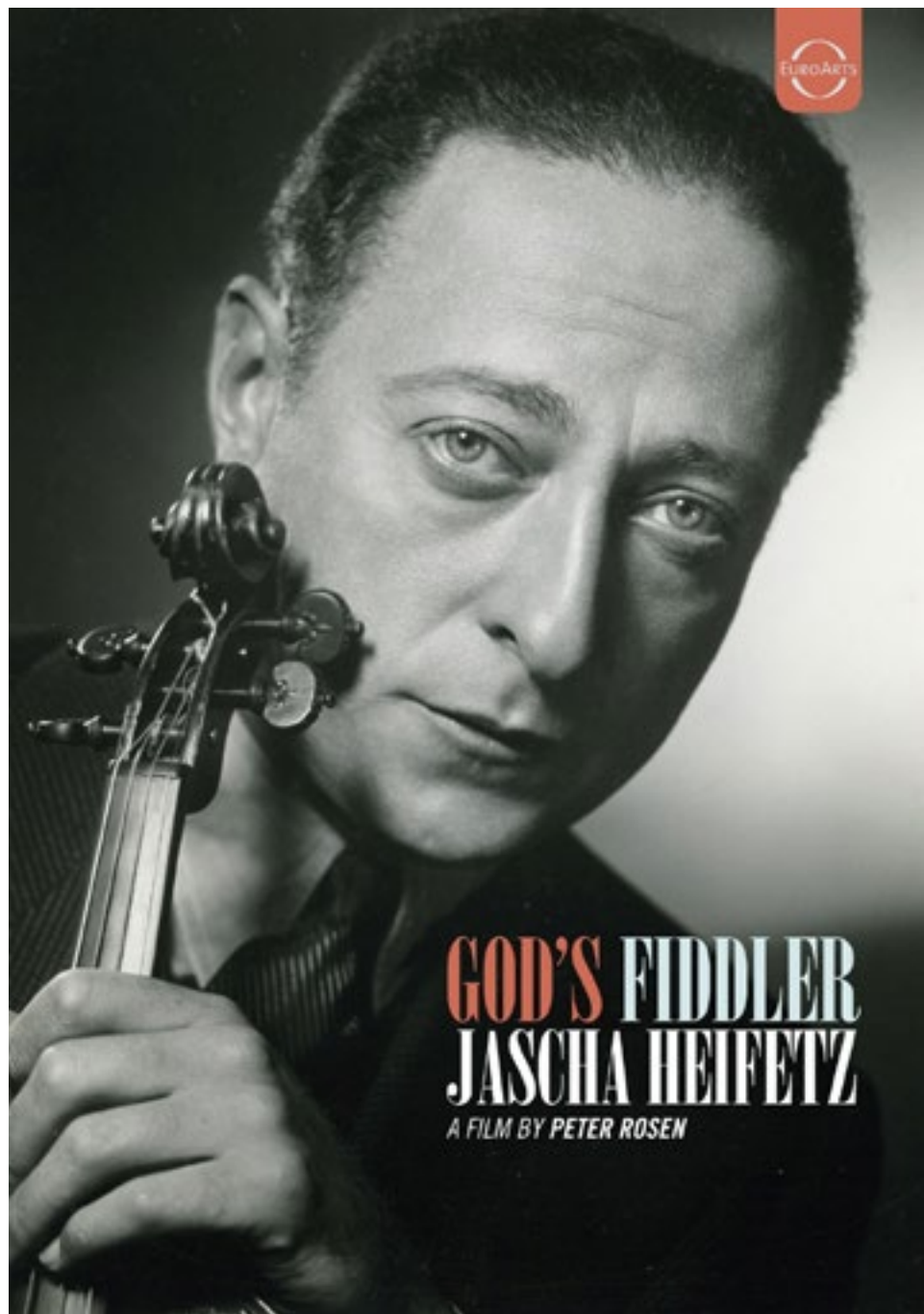
后人回看这段关系，难免视为天意。

而另一位大音乐家，霍洛维茨，和海菲茨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固执、脆弱、任性、不会爱，能把身边的人气死。不过，许多天才怪人可能生来是天才，但并非天生是怪人，他们的自恋、自我保护、害怕接近别人的毛病，其实是在环境中形成的。既是众望所归也是众矢之的，明星本来就会比常人遭受更多的误会、嫉妒和伤害，而

古典音乐明星还有一些特点，比如格外孤寂——他们需要自幼严格的练习，再有就是对艺术的极度苛求。而这类精益求精的经典艺术，和日常生活有着清晰的距离。没有童年、自幼就被拔出普通土壤的人，日后的生活是难以预料的，谁也难说环境和他们的剧烈冲突会把他们的人生推到哪里。最终，有人正常，有人敏感，有人狭隘，有人慈悲。

海菲茨虚荣吗？爱名声吗？他活跃在舞台上的时候，从来不给自己做广告，躲避采访，不评论自己和同行，不许崇拜者靠近，然而可以想像的是，他对名声非常在意，知道公众之可操纵，知道他们容易忘记明星——哪怕他这样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海菲茨退休后，真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了，乐迷不会忘记他，但年轻人们，如果不是音乐爱好者的话，确实不了解他了——曾经躲避粉丝的海菲茨，现在可不会因求仁得仁而高兴。细心的阿格斯发现，和海菲茨出游的时候，在身边安排至少一位听说过海菲茨的伙伴，才能让他保持愉快的心情。那么海菲茨是个卑琐的人吗？当然不是。他常常对自己的管家很吝啬，向人借了钱也不主动还（他的原则是，被借钱的人应该主动去要），但他在战争、灾难中慷慨地捐款——可以算是最早捐款的名艺术家之一，他还到危险的前线为士兵拉琴。他将余生的二十五年献给了教学，希望把自己的老师奥尔的传统接续下去。

判断他人是难事，判断艺术家的为人



尤其是刺多扎手的话题。我不敢妄评前人，但还是想起傅雷的话，“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我对此颇有疑惑。人要活着，音乐家和人是同时做的，也是互动的，怎么可能做完一个再做一个？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也未必曾经刻意“做人”。而艺术家们中，人格不平和、心理偏狭、病态的多不胜数，因为艺术这件事，本来就和人生和世界的非常态相关，至少，“非常态”那部分，在表达中会获



得额外的鼓励而生长。我怀疑人如果心胸开阔淡然得一马平川的话，还要不要当艺术家。艺术本来就是“执”与“偏”的产物，是想不开的人、有问题的人所为。当然，艺术是多样的，艺术家也是多样的。艺术家中也有人格伟大、充满爱心的人——就像和艺术无关的群体一样。恐怕谁也无法证明，艺术家中的爱心人士，比例一定更高。对天真的人来说，艺术代表着高尚，又和种种美德完美融合，是理所应当的结果，也适合写进教育方针和人生理想，这说起来非常合逻辑。然而世界总是充满讽刺。

要说什么是什么的条件，我倒觉得，是

做艺术家这件事，能够把人带动成为一个比较纯粹的人，因为其路之艰险和孤独。但任何艰难的事情，无论是体育、科学、慈善还是照料卧床病人，都可能使人纯粹，所以跟艺术这件事，还是没什么直接关系。

这样说来，艺术不一定让人幸福、快乐、高尚，倒可能把人逼得失去人性，那么艺术有什么用？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不管读完海菲茨什么样的故事，他的演奏一如既往地整饬、热烈。那团生命之火的全部意义，也许只有存在。世界残酷、生命弱小——观看他人的艺术何尝不是对自我的怜悯。Q

禅意的色变

特约撰稿人 李清月 (上海, bossanoval982@126.com)















玫瑰色的你

——专访张悬

特约撰稿人 茱茱(香港, juju8711@gmail.com)

访问张悬是第一次让我觉得多余的事,我们算是看着张悬成长的一代,出道七年,她早已不是那个长发溜肩,眉目低垂唱着《宝贝》的小女生,间隔岁月交出的几张专辑,改变的远不仅是遣词拟句和对声弦的操弄,无数细微又庞大的枝桠从边边角角聚拢起来,一点点砍掉矫情和稚嫩,长成日臻圆熟丰盛的模样,然后被有心人察觉到,这大概已经是与外界最好的互通方式。

我们在中大山间的露台上见面,三月末雨季连绵的水汽在山麓里蒸腾起一片茫白,剪短的黄发清瘦的脸,张悬坐在我对面,认真地回答着一个接一个问题,一如她这些年在镜头前、电波中一遍一遍的解释和表达,香烟掏出来又掏回去,终于忍不住还是抽了两支。我们的对话从文学到音乐,到最后避不开的社运,张悬陡然一扫疲态,从椅背坐直开始侃侃而谈,她一向喜欢埋怨大家为何总是问她社运的问题多过音乐,此刻却难掩自己对话题的兴致。我们聊天时间有限,她的述说迂回倔强,划归歌手的界限,我见到的张悬特别如斯,叫人想起她“野人献曝”的《Stay-牡蛎之歌》:“我没看见但是我感觉/世界,像我一样安静激烈且深邃”。

五月张悬要在香港开演唱会,这次来中大参加博群音乐会,是她第一次在香港的校园登台,崇基礼拜堂里挤满了年轻的面孔,张悬抱着吉他在玫瑰色的光线里清清浅浅唱了几支歌,“你手里没有魔笛/只有一支破旧的大旗/你像丑儿挥舞它,你不怕脏的玩游戏”身处同一时代的我们都清楚这些词句背



张悬在中文大学接受采访



后的意义。这几年两岸三地频发的社会事件，张悬几乎都有发言与声援。在言行一致这件事上，起码她未辜负她写下的每一个骁勇的词句。此刻台上的她却像挟了魔笛，Encore的呼声险些掀了高阔的屋顶。三十二岁的张悬对着台下说：“We were born screaming, why shut up when we grow up”，我站在人群里，感觉到主流、非主流、偶像、小众这些标签在她一路的成长过程里怎样被擦拭掉，台上台下的张悬成了一个自然如水的存在。

“所有浮生里万千的脸孔/让我因为你们隆重”因为玫瑰色的你，以及玫瑰色的你们。

《日子》

有朋友托我转送一本书给张悬，中大人文学教授Gordon Mathews的《重庆大厦》。朋友在卡片里写：“亲爱的张悬，欢迎来到这座忧郁之岛，焦虑之岛，喧嚣之岛……我想送你这座森林大厦，一座全球化地城堡，希望这些快速剪接的故事有一天会成为你的灵感，让我们听到。”

好像一个楔子，我们的对白，就从故事开始。

问：我很喜欢你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好的创作者要跳脱抽象的表达，做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做一个好的Story teller你所付出的努力是什么？

张悬：与其说是努力倒不如说是回到生活本身，过日子，因为其实如何过生活基本上是我们唯一有可能比较能够理解生命是什么

的一个方法，比较能理解自己与别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好的story teller是能够理解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单独发生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是好的故事通常都会有的结构，就好像通过一个平凡的渔夫可以表现一整个时代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创作者在询问或者探索生命本质这件事上写来写去基本上还是透过人，透过我们做的事，透过我们在一瞬间可以留下来的心得去做，所以提到努力，我其实花的时间比以前还少，但现在比以前成熟一点，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我累积了很多认真过完的每一天。

问：是比以前更懂得思考，然后把跟生活的真实接触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张悬：对，也有可能日子越过越久，曾经也有一万个日子可以去产生心得，但现在也已



INTER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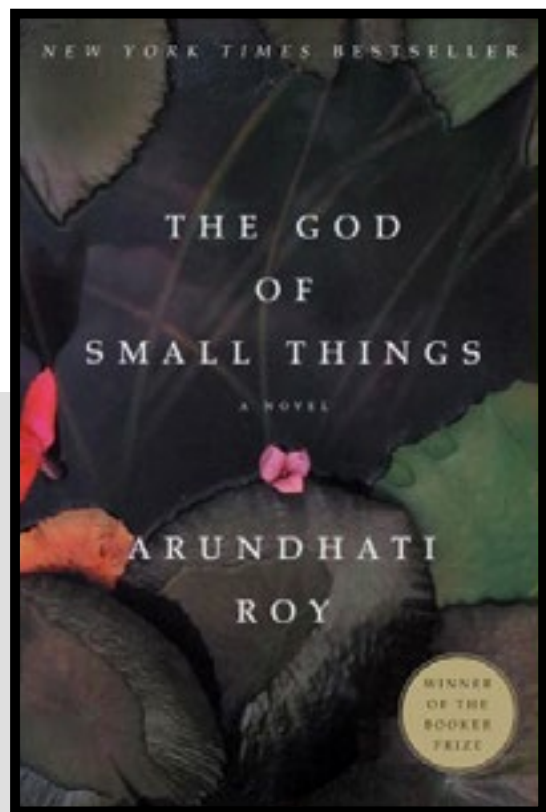
经有两万个日子了，两万个日子可以留下的东西很多，其实透过生活这件事情，你感觉到的虚无就是真的虚无，感觉到的辛苦就是真的辛苦，而不是因为恐惧而生的生活。

问：这也是黄春明老师给你最大的影响是吗？

张悬：对，因为我觉得他是台湾最会说故事的人之一。

问：在你心里还有哪些会说故事的作家？

张悬：我觉得海明威很会讲故事，然后我最喜欢的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她写过一本书叫做《微物之神》，我觉得那本书影响我非常大，那本书之后我觉得对写作这件事情更专心。你可以不求用白话的形式讲，但你可以用洗练的方式讲，你不一定要为了让别人懂而把一个很美丽的东西讲穿、解剖，《微物之神》就是讲印度的种姓制度跟时代的故事，影响了我看世界的方式。那些世间微小的东西、声响，哪怕是一个破碎的汽水瓶，其实都有我们深深的哀伤，都投射着我们活着的喜悦跟愤怒，主宰着这些微小事情的东西也主宰了整个宇宙，而不是主流的价值观里面以为的英雄改变时代，而是那些琐碎的、在我们地球上不断与我们产生连结的事情。



《微物之神》 洛伊 著

问：魔幻文学对你影响也很大？是不是因为魔幻文学比较贴合你的思维以及表达方式？

张悬：对，有些人看得懂九把刀，有些人看得懂夏宇的东西，我觉得我看得懂魔幻文学的东西，这跟写得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天生就知道这种人运用词汇的方式跟你很贴近。比如说，“一个像粉红大象的云像嘉年华一样经过我面前”，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能理解的。

问：你很执迷于那种很意象化的东西？

张悬：对，因为喜欢魔幻文学的人，对人性应该都很有兴趣，但其实都应该花很多时间去体验大自然，你会发现大自然充满了意象



化的东西值得去形容和被珍惜，就好像海洋世界也是一样，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描写海底世界，绝对不是“干净”、“清澈”。所以魔幻文学就是介于你的想象力和大自然的无限可能。

问：喜欢的魔幻文学作家呢？

张悬：我自己喜欢……马奎斯我觉得还好，我自己喜欢波赫士（博尔赫斯），但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洛夫，还有沈从文也很魔幻呐。

问：几年前你说那首受魔幻文学影响的《Stay-牡蛎之歌》是你“里程碑式的作品”，现在还这么看吗？

张悬：才写了几年（笑），我还不知道怎么回头看，但我还是很喜欢那首歌，我觉得那是我心里一直希望自己能写出来的那种作品，但是心里能写什么不代表你就可以写出来，但牡蛎之歌写得意外的流畅，没有任何一个赘字，每一个词都有它独特的、双关的、或者是很魔幻的含义，我认为它非常贴近我这个人想要贴近的东西，所以就成为我一个私藏品，你知道就是说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是自己觉得最完熟的东西。

问：敝帚自珍的感觉？

张悬：野人献曝，对！一种野人献曝的感觉。（笑）

问：私下里觉得你是一个天生拥有诗意表达能力的人，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一个歌手会做一个诗人？

张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其实没有觉得非要做歌手，所以那时候当歌手我对大家认定歌手要做的事情是比较疏离的。我心目中的歌手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能给的其实就是我怎么做歌手，而不是我去做歌手，所以我也不会刻意去做诗人，但这样的时光里我写出来的东西反而可能是诗，真的做诗人只是写出类似诗的东西。

问：感觉这两年你“做歌手该做的事情”，包括上节目、跑通告，比从前游刃有余多了。

张悬：还好，其实这是一个往上爬的过程，一开始你可能不会碰到好的机会和缘分，群众聚集的过程也需要时间，但一旦有了基础，很多东西比较容易成倍数成长。从两百人到三千人很难，从三千到八千好像不是那么难，所以很多人想要操控传播的能力。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我的听众，或者祝福我这样的歌手存在的一般民众，给了我非常多的幸运，如果说我是这样的人，倒不如说我们这样的时代有一群人愿意去听这样的东西。



《如何》

问：你从live house出发，现在舞台越来越大的过程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悬：意味着我可以把我的团队照顾的越来越好，两百人的观众其实是非常简单方便的，一天就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过完，歌也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唱完；三千或五千人意味着你可能有更多的资源，你可以让跟你有同样信念、与你一起工作的人，不只是陪你受苦受难，而是能够做到回过头来看想要呈现给听众值得呈现的音乐的可能，我不确定做不做到啦。

问：这也是做独立歌手和做乐团的区别吗？

张悬：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歌手或在做乐团哎，因为我有见过真正的乐团，在我的观念里真正的乐团跟你们认为的乐团完全不一样，真正的乐团不会坐在这边回答记者，好像一定要抽丝剥茧讲的东西，真正的乐团做的音乐其实无所谓贩不贩卖。我不认为Nirvana会坐在这里讨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不会想要跟记者讨论药物的问题，他们只要做好他们的音乐，不管有多少人想要穿凿附会地去想象或者去追求、跟从，都不关他们的事，如果以他们的标准来看，其实我不算是做乐团的人，我也不算独立歌手，因为我曾经是签约歌手，好多年呢。

问：你有很多事情都是“白手起家”，比如说弹电吉他，比如做音乐制作人，还尝试过哪些事情？

张悬：弹钢琴啊，嗯。30岁其实想花点时间学口琴，也想花点时间把钢琴再学好一点，因为有时候编得出来弹不出来其实蛮痛苦的，得到处找人帮你弹。

问：有尝试又放弃的吗？

张悬：电影啊，哈哈，没有啦没有啦。效果器吧，我觉得对于效果器目前还没有开窍。

问：自己当音乐制作人跟做单纯的创作者有什么不一样？

张悬：还好，遇到不愿意听我话的乐手还是很痛苦，但是制作人比较需要协调的能力或者需要很好的品味，那结合这两种东西惟一的优点是，你既是歌手你又可以自己制作，所以你知道自己要某些东西，别人在某些状态上是比较愿意陪你去尝试或者比较愿意听你的，因为如果你只是歌手，别人会嫌你话多，如果你只是制作人别人会嫌你武断，但是身为一个制作人我拿我自己开刀，拿别人开刀，说不定别人还会觉得你有一点勇气。

问：你自己的作品是喜欢自己制作，还是



INTERVIEW

交给别人打磨，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碰撞？

张悬：我很愿意交给别人，其实我什么都很愿意交给别人做，但这就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就好像说谈恋爱还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我觉得我的缺点其实是，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在想什么，可是我讲的东西真的不是很好懂，有时候我看起来很努力在解释，其实我只是很努力在分享，有很多东西我说得不是很好，或者不能只用一句slogan让大家觉得：就往那里去就对了。所以其实在沟通的过程里，我不敢说我那么在乎的那些琐碎的细节当下大家会觉得那么重要，所以就很难托付给别人，不管别人能力有多

强。那我是一个非常在乎声音细节的人，不是说刻意，而是你可以保留一些天然发出的声音——有瑕疵的手感，瞬间爆发或消失的声音，对我来说那个是自然，只是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敏锐的动物，如果你够小心或是愿意去搜集，你才有可能去专辑里呈现出一个不是你要什么的東西，而是自然可能发生的事情被好好地放在专辑里，所以我会希望能遇到这样的人把专辑托付给他，那在此之前的话我就先鞭策自己。

问：你好像很喜欢“自然”，之前那首《如何》就是在谈两个生命之间能够不滥情地、自然而然地互通、对话；说到创作你也希望去除风格定位的企图心，自信地回到自然，



张悬在中文大演出现场



“自然”是你追求的一个理想状态吗？

张悬：还好，我只是被记者问过很多次关于“努力做音乐”，我觉得音乐并不是努力做出来的。

问：音乐出来应该是一个如水的过程？

张悬：嗯，努力出来的音乐并不一定是好听的，努力的过程是为了自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努力学电吉他，或努力学制作，或者你写一首歌词愿意改三个月，那不是因为努力，而是因为知道在那之前一切还都比较有矫情的痕迹，你愿意去磨这个东西，你就有可能回到自然。就好像你练一个电吉他的句子，只是四小节，你练两万遍，最后你看都不用看就能弹，那就是自然，但中间有一万次的时间你基本上是故意弹出来的或硬要弹出来的，对我来说当然不想把硬要弹出来的东西给别人听。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说想要追求自然非常的容易，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提醒的词，你永远其实都可以更谦卑一点，更lay back一点，去看待生命中不断在发生的事情。

问：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个磨的过程？

张悬：对……但是有些人不用磨，我有见过天才他们不用磨，我的吉他手和鼓手都是天才。我需要磨，但我知道我磨完了有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天才，你知道好的东西在哪里，反

射性的你也会懂得分辨这个东西的好坏，别人可能十次做得到，我可能需要两百次，那就去做啊，反正我时间很多。

问：你有琢磨过自己的唱腔吗？

张悬：我喜欢的歌手都不是美声派或是技巧派的，但我喜欢的人不管音准不准，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会唱歌的人。其实Bob Dylan也很会唱歌，你知道你发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很多人有好嗓子但不会唱歌，通常会唱歌的人都有一付好耳朵，他知道自己声音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知道他要用什么口气去讲一句话，这种人才是会唱歌的人，他并不是依赖一个技巧。我有好耳朵，但我的嗓子并不是千锤百炼型的

问：跟人打交道也需要磨？

张悬：那个没办法我一辈子都学不好。我妹就是一次都不用练，我可能练了四十万次活到三十岁，还是没有她讲一句话好，真的。我妹真的很厉害，她永远都知道如何在一个充满危险的状况下面对谁说什么话，让什么事情有什么结果，让什么什么决定能够照顾到最多的人，很强。

问：你有提过你是一个极限艺术主义者，这一个阶段你希望打破些什么？就好像最早的《宝贝》你其实就很想摆脱那个路子。



INTERVIEW

张悬：我觉得我没有做过什么很极限的事情，除了拿一把吉他唱歌以外，但是好玩的地方在于，我不一定要是那种人我才能支持这种事情，就好像我现在酒喝得很少了，但是我依然祝福每个年轻人都要喝醉过啊，就是你能够appreciate很多事情的好，体验的可贵，或者是艺术跟社会之间那个关系上面应该有的冲撞，也许我最大的专长不是激烈，而是坚决，但我永远支持很激烈的人。

问：打破固有的定式？

张悬：还好，还好，但我其实还蛮期待我身处的社会可以打破点东西给我看，因为一个人打破一个瓶子，看起来就是一个announcement，十个人打破一个瓶子那个是行

为艺术，五百个人打破一个瓶子那叫什么？（革命吗？）一万个人打破杯子，那就是一件……正常发生的事情，从很吊诡变成一件极其正常的事，但其实很多人性的事情是极其正常的，只是在文明社会被贴了个标签被抓去坐牢很久。

问：李寿全老师作为台湾音乐界的老前辈，应该是见惯风雨，他对你有什么期待？

张悬：我觉得因为他见惯风雨所以他对我没什么期待，他可能很希望我快乐吧。

问：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悬：快乐吧，他是一个非常细腻浪漫非常温柔的人。



张悬与恩师李寿全同台



INTERVIEW

问：这些会体现在你的创作里吗？

张悬：你觉得我歌里有爸妈吗，有朋友和爱人吗？有的话一定有李老师。但是不会刻意为他写歌啦。

问：你的思考方式似乎很特别，属于总比别人多想一点，这是从小就有的习惯吗？

张悬：还好，很大一部分是青春期开始，小的时候可能比一般的小孩子都天真烂漫一点，因为小时候生活非常简单，外公外婆养育

我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我从小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常大自然的环境下长大，但一回到爸爸妈妈家念书就仿佛瞬间社会化了，我一直说我的社会化经验其实从八岁就开始了，

问：在一个碰撞的情况下发生？

张悬：嗯，老人带着小孩，时间上是缓慢的不需要规则的，所有相处是自然的，所以回到城市家庭是非常不适应的，但这种不适应可能是天生的，因为我对这种东西天生比较敏感。

《危险的，是》

问：你有在Facebook上向大家推荐一本反思“正向思考”、“正能量”的书，觉得那是自我审查。

张悬：那是一种暴力，你不觉得正向思考是一种暴力吗？一堆年轻人在那里“正能量”“正能量”，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口口声声追逐的正能量，排挤了、否定了、回避了多少这世界上真实的事情。但哪天如果所有年轻人都说，忧郁是体会人生的第一步，讲久了大家也会痛恨忧郁这件事吧。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千万不要把自己淹没在一个口号和名词里，你的人生不是尼采的，再怎么喜欢尼采，也不要以为照着尼采的话去过人生就会正确无误，人生的任何一个名词在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

能像上帝一样不用去质疑。所以年轻人要停止造神这件事情，对一个现象，对一个词，对一个人，对一个梦都不要。

问：你之前有讲过你觉得你爸和你哥很了不起，让很多人的人生变得值得，而你只是成就了自己，如今你也影响了很多，有意识到自己小宇宙的延伸吗？

张悬：每个人都想要被影响，就好像我也终其一生想要找到我好爱的作家，想要找到一个我好喜欢的男朋友，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想有追求和寄托，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很少鼓励大家把我当成寄托，因为整个亚洲或者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其实都在面临这个世界很大的



转变，所以其实与其说我为别人做了很多事情不如说很多人想要为生存的世界做很多事情，所以才找到一个有别于偶像之外的寄托。

问：有点像每个人都想找一盏灯照路。

张悬：但其实并不是灯本身做了什么，（而是大家在主动寻找的过程？）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很好的把我放下，我还是预见下一个generation有可能会出现更多很有趣的人，他们也许会推翻我们这一代人会做的很多事情、说的话，那虽然会跟我看起来很不一样，但说不准我心里会非常高兴。

问：你从第一张专辑之后就慢慢停止了个人感情的抒发，开始把自己放到整个社会中去，提供另一个看世界的眼光，这也是近年很关心社会的原因吧？

张悬：这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这个generation一定要度过的过程，所以其实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但是作为歌手，你也不能不看不听这个世界啊，我不想要靠做梦卖钱，所以我所有赖以生存的方式基本上都可以尽可能减少对别人的伤害，甚至也能提供一点别人求生存的机会或空间，但我不能说我觉得很好，但这句话放在心上，你至少在面临一些非常关键的选择的时候，你不会以为别人生存的机会或权利是可以被交换或视而不见的。

问：那回到那个永恒争议的话题，歌手

到底要不要参加社运？

张悬：这是个很好玩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再用身分去看一个共同发生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事件，占领华尔街，其实反映的是在美国将近一世纪用西方最强的权威去主导世界所有面向的发展，occupy wall street基本上想要摧毁的就是邪恶的轴心，就是金融。就好像你叫一群兔子把自己的胡萝卜存去大野狼的银行是一样的，虽然他每个月会多给你半根胡萝卜，但最后他就是想把你养肥把你吃掉啊，对不对？但是大野狼已经通过各种法律的设定不让别的小白兔开银行，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大野狼开的银行。所以回到社会运动，我们群众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一个真正大的觉醒，就是跟人有关的东西，就算只是发生在某种，或者某个人身上，他都不是只是这个人在承担的事情，只不过这个人今天上了新闻。

问：前段时间罗大佑因为避谈反核问题被批“晚节不保”，他说“我不喜欢被逼着表态”。

张悬：那是媒体的问题，当罗大佑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罗大佑说了这句话，我看事情就比较是这样，大家跟我说罗大佑讲了这句话，但实际上不是他主动讲的啊，显然是他被逼着表态所以他讲我不想被逼着表态，所以重点是被逼着表态这件事情哪里好。媒体的企图心永远会淹没事实的真相，媒体永远企



INTERVIEW

图笼络最大的舆论，那笼络舆论基本上是非常耗心耗力的事情，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失败，所以大家就转为操作，这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现象嘛，企业也是这样啊，但是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其实不被逼着表态就是我也不愿意依靠媒体，所以我有被言论封杀或者被蒙蔽的可能，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观点。

问：你之前有讲过巴奈为了做社运在音乐上其实放弃了很多。包括胡德夫在后来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社运中而不是音乐上，这个是个人的选择还是社会环境所逼？

张悬：都有都没有，重要的是这个社会需不需要歌手好好做音乐，如果需要，那你就要停止让还有一点知觉的音乐人为了一个音乐本来就在颂扬的崇高的价值而不做音乐。所有的有知觉的，不只是为了求温饱，而为了让更多的人不需要被牺牲而努力的人，这个过程其实比大家以为的要痛苦多了，只不过这些人已经开始理解到，看着他人被牺牲或者看着这个世界不断地被操作或被运作成这个样子，基本上是最痛苦的事情。有点像黑客任务一样，醒过来发现这个世界是被操纵的是一天，你不醒也是一天，但是人不可能不遇见虚无这件事，所以你每次面对虚无的时候，你是把它挖个洞埋起来然后再等下一个虚无出现，就像见鬼一样，还是说有一天你停止挖洞，然后……（去面对它？）对，但我不希望这是很多人决定面对的事情，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好，但我确实觉得现在有些人在为群众承担群众应

该承担的问题。而且承受了群众以为这只是他个人选择或个人的愤怒而已。

问：这也是《玫瑰色的你》想表达的？

张悬：对。

问：这次巡演的主题“潮水箴言”是你自己起的吗？灵感是来自？

张悬：灵感来自于我……对人生很真实的感受，但是也可以说是死文青随便发明的名词，（笑）没有啦没有啦。潮水是我有一阵子，我大概是从前两张专辑开始，很多记者会问低潮、寂寞的时候听你的歌会好受很多，那你怎么看低潮这件事情。所以“低潮”这两个字就让我想了很久，好像这个社会教我们这辈子只能遇到几次低潮，而且还要想办法克服，我反而觉得人生真的就像海浪一样，不是高潮低



张悬与巴奈在反美丽湾的集会中



INTERVIEW

潮的问题，是涨潮与退潮的问题，没有所谓正面或负面，悲观或乐观的问题，（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嗯，很多记者喜欢用二分法问问题，所以他们常常觉得我回答的问题很迂回又模糊，但是既然你要讲这些大字眼，那你就不能只是讲快乐或者不快乐，成功或是失败。所以潮水箴言想要讲的其实是，面对人生未知的喜悦，已知的哀伤以外，人生其实是燃烧的过程，可以看得见涨潮之后往后退，退到绝境以后你看到远方有东西正在崛起，我看待时代看待人生都很像这样，所以潮水箴言是我很想做的一个project，所以跟大家熟知的演唱会会有点不太一样，它结合了一个投影的技术，我也希望不是开个主题的巡回，而是一个系列的作品，2013年我感觉到创作者、听众与这个时代中间现在的交集是什么，我去表达这个东西，然后去传达一些message，比如说五年之后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然后我们那时候摒弃了物质，重新回到探索内心这件事，那我可能还是潮水箴言，来唱这样的歌，其实算是我个人想要做的一个project，就觉得，30岁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新试试看，失败没有关系，只要知道这条路多难走就好了。可是我总觉得流行音乐不应该自绝于任何艺术之外，我觉得它跟很多东西都是有碰撞的，但是华语流行乐坛已经很不常见跟别的东西碰撞出来的音乐，跟社会无关，跟爱情无关，跟同情心没有关系，跟真正的愤怒也没有关系，一切都只是讲讲而已。所以我只是希望“潮水箴言”在各地举办的时候，用这种吃力不一定讨好的方式，呈现给一些可能需要这些message的听众，也



许他们会发现他们没有那么孤单，也或许在亚洲可以有这样概念性的演唱会可以做，它不用大，但是可以让听众觉得分享到的讯息很值得，然后不再各自被孤立。

问：你刚才说过occupy central的事情，我在伦敦有去参加，我在香港也有参加社运，可是我觉得在中国搞不起来。

张悬：华人是搞不起来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second hand, second hand的东西永远是搞不起来的。你看，香港人能忍受因为劳工罢工，所以青少年放火砸街抢电视吗？香港人是不会接受这件事情的，但这是英国青少年的文化，所以英国才有庞克。



INTERVIEW

问：我在英国念书就觉得很不同，他们说什么话题都很自由很开放，你刚才说香港人很强悍，所有的强悍都是自己被逼到一个地步他才会去做，占领中环这个活动，我们做社运的人觉得很无力。

张悬：其实全世界做社运的人都觉得无力，他不会因为西方国家开发得比较早所以不无力，真的，我觉得西方人的社运现在还有一点幽默或者懂得做道具了，看起来比较像行为艺术，但还是比较无力，像我那时候在看国家地理频道讲，一群在保护海豚跟鲸鱼不要被挪威跟苏格兰海岸包括日本这些国家捕杀，但是他们都有杀鲸鱼的习惯嘛，但是那是人家的传统，他们为了保护鲸鱼还会去冲撞别人的船什么的。但亚洲对于暴力的了解、认识还有立场是非常非常幼稚的，有点像末代皇帝溥仪一样是非常孱弱的，就是说我们拥有那么高的道德标准，有那么高的艺术历史水平，所以我们很孱弱，扛不起来，我们对于这种拿命去搏的东西已经界定为不理性了，已经界定为没有意义了，亚洲的道德让亚洲人很爱高来高去，所以我们可能都很羡慕西方国家那种流血流泪那种感觉，因为那个impact很强。

问：可能是因为比较有比较，香港的社运和台湾的社运都是比较不完美的，香港就是比较喜欢取自popular的，比如说同性恋可能有一两个人在说，可是所谓民主自由没有人（歌手）说话，好像只有我们一班人在做。

张悬：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不是必然的结果，我们假设看好了，台湾也有被日本殖民过，香港也有被割让给英国，日本跟英国都是很懂得管理殖民地的国家，所以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留下了很发达的农耕，农业跟医学的技术，而香港人因为英国殖民的关系开始变成西方贸易的桥梁，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港中心，香港的信息在过去三十年是非常领先亚洲其他地方的，但我们被日本殖民的时间很早，结束得也很早，后来国民党就来了，我们就经历了很多白色恐怖啊，戒严啊，大家抗议啊，被抓走啊，大家就很害怕抗议这件事情，后来发现不能害怕。后来国民党也比较开放了，开始有自由选举，然后开始经历反贪污啊，然后你看，这五十年就过去了，香港的五十年才开始。

问：我觉得香港的殖民还没有结束……

张悬：对，但其实就跟现在很多台湾老一辈人还是那么想念日本，那就代表殖民还没有结束，比如说1935年台湾被归还，香港1997才被归还，中间差了五十年，所以现在比起来，当然还是觉得台湾现在比较能做一些事情，香港大概三十年后也会开始经历社会运动的高潮，但是可能就像“潮水箴言”讲的，你真的要让退潮退到海岸线都露出来了以后，才会看到有些东西又要卷土而来，我觉得生而为人，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渺小，所以我们会很害怕等不到有生之年看到这件事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形而上的东西看，我们



INTERVIEW

其实就是一群collective soul, 聚集的灵魂, 在每个年代把自己当成不同的十块钱投入不同的存钱筒里, 哪一个先满了, 哪一个先被砸出来用, 所以, how you devote to it, 决定了以后什么事情会发生。

问: 我认识很多香港的歌手, 他们其实对于政治也有意见, 但是他们不敢讲。

张悬: 那就代表他们的原因还是比他们的意见重要, 在这一刻。

问: 是, 可是如果你是他们的话, 你觉得有什么是可以说的?

张悬: 我会先想想我人生的priority是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至少是我很早就做了的决定, 我人生的priority就是所有别人都可以拿走的东西我都不想要, 比如说钱、名誉什么的, 所有你可以给我又可以拿走的东西, 这辈子都不会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问: 失无所失?

张悬: 无欲则刚。

关心我生命中最不能失去的东西我才有更多的时间, 而且我会投入我的生命去捍卫它, 比如说我的家人, 比如说我心目中认



为音乐该是什么, 对于很多艺人来说, 谁都有意见, 所以其实他们只是有点害怕自己落后, 大家会看清他们, 但其实不用, 你要接受把自己的店看得比别人的店重要, 别人的店被烧了, 就不要讲, 我也很在乎他过得好不好; 但是, 你知道每个“但是”后面都是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不要再有什么但是了。

(就是选择) 对对, 所以其实priority这件事情就决定了很多事情现在的发展, 但是如果有越来越多人觉得, 因为我很在乎我的店, 所以当别人的店被砸了, 我发现三个月到五年内你的店也有可能被砸, 然后那时候别人也会对你说可是的时候, 你也许会调整, 因为你在乎你的第一名: 你的店, 所以你要去把你的第二名: 别人的店顾好, 这样你可以保住你的店。Q



普罗米修斯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